

《特稿》

近世「儒」的論說與變遷

——知識的典範轉移

鄭吉雄

摘 要

本文論近世「儒」的論說與變遷，從蒙元修撰《宋史》、滿清修撰《明史》皆於「儒林傳」外另立「道學」或「理學傳」談起，檢討諸儒的言論，以見明清儒學典範轉移的關鍵。筆者揭示「儒林」一詞，認為歷史上「儒」為一群體形成之社會階層，與時代升降相為表裡，故「儒」的身分設定，取決於群體自覺，以及群儒的治學內容。明末儒學衰微，肇因於儒者耽於「理」的討論導致知識嚴重貧乏，由此而引起儒者掀起的知識多元化運動，從文章、經史、經世等各類知識充實儒學，進而奠定清代儒學的基調。明清儒學典範性轉化，實受惠於晚明儒學衰微的刺激。故清代多元而充實的儒學開花結果，實得力於晚明儒學的花落腐土，化為春泥。

關鍵詞：儒、儒林、理學、明末清初、典範轉移

* 鄭吉雄現職為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文化歷史講座教授。

** 為尊重作者，本特稿格式不依本刊撰稿體例調整。

Shifting Discourses on “Ru” in Modern China: A Paradigm Shift

Dennis K. H. Cheng

Abstract

Beginning from discussing the separation of *lixue* (理學) and *daoxue* (道學) from *rulin zhuan* (儒林傳) in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hifting discourses on “Ru”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d attempts to reexamine existing scholarship by revealing the key factors leading to the paradigm shift of Ru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ase on the term *rulin* (儒林), the author considers “ru” to be a social class composed of literati who influenced history through their collective self-awareness as well as their way to define *zhi* (知, knowledge). The crisis of Ruism of the late Ming period was due to the fact that intellectual pursuance turned to be superficial and fragmented discussions of *li* (理, reason) instead of substantial integration of cross-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e new paradigm of Qing Ruism essentially benefited from the flaws of the late Ming Ruism, moving away from empty discussions of *li* and revital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cross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levels.

Keywords: Ruism, philosophy, philology, late Imperial China, paradigm shift

* Chair Professor of Cultural History,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為筆者 2022 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第八屆「新亞儒學講座」第 1 講講稿之上半，¹旨在提出知識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以重新解釋明清之際學術思想變遷的關鍵，並說明晚期中國儒林群體自覺運動。

學界就明清學術思想的轉變，曾有眾多解釋，其中牟宗三（1909-1995）以其儒學地位，影響甚鉅。氏著《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序》論劉宗周（蕺山，1578-1645）之學：

夫宋明儒學要是先秦儒家之嫡系，中國文化生命之綱脈。……自劉蕺山絕食而死後，此學隨明亡而亦亡。……是故自此以下，吾不欲觀之矣。²

17 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儒學，牟先生竟因為「中國之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遭受重大之曲折」沒再寫下去，³十分可惜。非漢民族入主中國，滿清並非首例，之前有蒙元，再向上推還有唐五代，再上推則為五胡，雖未必為一統朝代，民族衝擊惹來災難也絕不小。何以牟先生獨不願講清代呢？再說，滿清入關後，儒林並沒有消失，儒學仍在延續，直至 20 世紀初政治倫理制度天崩地解，科舉廢止，儒學才真正退守，以大學為主要寄身之地，在社會各領域漸趨沉寂。盛世的儒學值得研究，衰世的儒學不是更有討論價值嗎？如果說今天儒學仍有研討價值，入清以後反而不值得討論，這在道理上恐怕說不通。再說，從歷史角度看，中國傳統有千千萬萬的儒者，說明「儒」是一個超越時代，跨越政治、社會、倫理的群體。獨樹不成林，正史「儒林傳」所謂「儒林」，其意義即在此。孔子——歷史上第一位儒者——平生困厄侘傺，卻勇於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年復禮正樂，說明對抗逆流就是儒者的宿命。孔子為後儒做了優美的示範。那麼滿清入關，民族文化生

¹ 此課題原已囑及門傳凱瑄撰成博士論文，其文聚焦於康有為（長素，1858-1927）、章太炎（炳麟，1869-1936）、胡適（1891-1962）。傳君博覽深汲，但與筆者視角與關懷不同，故傳君已討論的，筆者不再複述。見傳凱瑄：〈近代中國學界對「儒」的論爭（1840-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2017 年），及傳凱瑄：〈康有為《教學通義》撰作時間考辨——兼論其思想之轉折〉，《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88 期（2017 年 11 月），頁 33-71。

²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年），頁 3。

³ 同上註。

命遭受曲折，不是正好給我們一個機會，仔細看清楚「儒」如何秉承孔子和歷代諸儒的精神，應對民族文化的挑戰嗎？我的意思是，既然太平盛世的儒學值得探討，沒有理由「陷於劫運」的儒學沒有考察價值。⁴其實牟先生不寫入清以後的想法，在《中國哲學的特質》第 11 講交代得更清楚：

可惜清代三百年，由於滿族的高壓，學者被迫研究沒有生命沒有血肉的考據學，民族的慧命窒息了，文化的生命隨之衰歇了，二千多年的學統亦亡了。⁵

牟先生這段話鏗鏘有力，卻恐怕站不住腳，因為據明末清初大量學者所說，儒學在明末已經衰敝，不待清人入關；而且考據學大盛於 18 世紀，清初尚在萌芽。換言之，以此為「因」，並無法解釋儒學衰微之「果」。退一步說，入清後儒者雖歷滄海橫流，學術活動仍不斷，若謂滿清入關後儒學與文化生命衰歇，亦恐非事實。牟先生的論斷，恰好為本文帶出兩大問題：

（一）儒林、儒學的出路、轉化何在？

（二）異族乃至異端問題對儒學的衝擊為何？

限於篇幅，本文討論問題一；問題二將另文處理。

二、從儒林的群體自覺與個體自覺談起

從歷史考察，儒學從來是群體運動，少數大儒雖有代表性，卻未必足以反映一代風潮。例如歷來講宋代理學多推重北宋五子——邵雍（康節，1012-1077）、周敦頤（濂溪，1017-1073）、張載（橫渠，1020-1077）、程顥（明道，1032-1085）、程頤（伊川，1033-1107）為北宋理學代表，而錢賓四先生（穆，1895-1990）在《宋代理學概論》一書指出宋學的成就，需追溯教育、辭章、藝文等多方面，必以范仲淹（希文，989-1052）、胡瑗（安定，993-1059）、孫復（泰山，992-1057）、石介（徂徠，1005-1045）等為先。錢先生為學界拓寬視域，說明了「儒」之稱為「林」，沒有群體戮力實不能竟其功，也審視「儒學」作為「儒林」共同潮流之事實。由此出發，儒學本質為何？知識方法為何？真理如何獲得？等等問題，也才能一一引導出來。

⁴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3。

⁵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 年），頁 120。

清代考據學興起，依余英時師（1930-2021）之說及學界眾多研究，可推到明末陳第（季立，1541-1617）、焦竑（弱侯，1540-1620），過去很多講清學的都這樣講，不遑列舉。但考據學真正大盛在乾隆年間，而順、康、雍三朝考據學尚未成風；至於理學家反而充斥清初朝野。其時儒者大談經學、史學、經世，正是厭棄了明末「講學」風潮（包括心學、儒釋會通等），也就是《中國哲學的特質》聚焦的儒、釋、道三教議題。事實上明末以來，講學風氣魚爛，幾受儒林共厭。借用清初王源（崑繩，1648-1710）對理學末流的批評：

歎天下無事不偽，而理學尤甚。今所號為儒者，類皆言偽行污，不足起人意。⁶

理學令人厭棄的情緒，早在明末已瀰漫社會，足見儒學衰疲已極。明末時期，滿清尚未入關，更談不上有誰被迫研究考據學。我們回顧 17 世紀中葉這一段歲月，儒學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所謂「牆倒眾人推」，為何被群起蔑棄？這才是需要釐清的問題。否則，對明末儒學墮落的責任推諉予滿清，今天要講儒學也很難有理性的思考。

本文將以思想史觀點討論近世「儒」的源流，討論對象包括但不限於理學和理學家，兼及儒學主要知識領域——經、史、文學、思想等等，尤其著眼於「儒」作為一個群體——儒林，面對大環境變遷時的自我批判、回應與自我調適。此種自我批判、回應與自我調適即余英時師《中國知識階層史論》的「群體自覺」：

所當申論者，即士大夫之社會成長為構成其群體自覺之最重要之基礎一點而已。惟自覺云者，區別人己之謂也，人己之對立愈顯，則自覺之意識亦愈強。東漢……中葉以後，士大夫集團與外戚宦官之勢力日處於激烈爭鬥之中，士之群體自覺意識遂亦隨之而日趨明確。⁷

還有「個體自覺」：

⁶ 〔清〕王源：〈與李中孚先生書〉，《居業堂文集》，收於〔清〕王灝輯刊：《畿輔叢書》第 46 函，收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第 94 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卷 7，頁 9a。

⁷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年），頁 206。

所謂個體自覺者，即自覺為具有獨立精神之個體，而不與其他個體相同，並處處表現其一己獨特之所在，以期為人所認識之義也。⁸

余老師討論「群體自覺」的對象是東漢中葉以後「士」階層，這和明末清初情形略似。而個體自覺，則從《周易·夬》卦所說「君子夬夬獨行」、⁹《論語·述而》「我欲仁，斯仁至矣」、¹⁰《孟子·公孫丑上》「雖千萬人吾往矣」，¹¹特立獨行，原是士君子行節指標。「儒」作為一個群體，固然常激於時代弊病，同有攬轡澄清之志，而成君子之黨，以糾正流俗，此所謂「群體自覺」；君子雖以道相合，卻不輕易屈己從人，儘管同歸，亦不妨其可以殊途，此所謂「個體自覺」。而英時師說：

近代的自由知識份子既不復具有壟斷教化的權力，因而也就不能成為一個特殊的階級。近代的知識份子來自各種不同的社會階級，他們已沒有一個組織嚴密的中古教會作後臺了。為了爭取社會上各種不同的集團的支持。他們現在只有在學術思想的領域內從事於公平而自由的競爭。¹²

英時師對自由知識分子的描述，並不限於近代。晚明時期士階層亦即「儒林」情形一樣，既非特殊階級，亦無嚴密組織。晚明社黨非常多，如張溥（天如，1602-1641）的「復社」、¹³陳子龍（臥子，1608-1647）、宋徵璧（尚木，約1602-1672）的雲間「幾社」等，此起彼落，組織大多鬆散。呂留良（晚村，1629-1683）說：

⁸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231-232。

⁹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收於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5，頁213。筆者按：「夬」義即「剛決」。

¹⁰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於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8冊，卷3上，頁7b。

¹¹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於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8冊，卷7，頁9b。

¹²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2-3。

¹³ 包賚《呂留良年譜》崇禎14年（1461）條：「張溥等始組應社，後合南北各省文社於吳郡，稱復社。」包賚：《呂留良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14。

自萬曆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為事，天下化之。士爭為社，而以復社為東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迄於浙，一大淵藪也。浙之社不一，皆郡邑自為，其合十餘郡為徵會者，莫盛吾兄季臣與諸子所主之澄社。¹⁴

社黨林立，既顯示晚明儒林風氣自由，也間接說明了明亡後儒者恥談心性、恥言講會，可能部分肇因於晚明講學活動的浮濫。我們必須釐清導致明末儒學敗壞的根本原因，才能理性地重新探討明末至清初儒林的群體自覺和個體自覺。

從《宋史·道學傳》首次在「儒林」之外提出「道學」之名的立意及其影響，討論到 17 世紀中葉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波濤，進而考察至 20 世紀期間種種轉折，看看「儒」的身分和「儒」的知識架構，在中國近世數百年間經歷了哪些挑戰、反思和深刻討論。

三、由《宋史·道學傳》到《明史》議立「理學傳」

近世學者對「儒」範疇的討論，肇始於元人修編《宋史》，在〈儒林傳〉之前置〈道學傳〉，收錄二十四位儒者，¹⁵並從歷史角度提出申論，追溯「三代盛時」，繼而「孔子有德無位」，而述及兩漢以下儒者「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讓「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最後凸顯宋儒對儒學義理的推至與整合，「融會貫通，無復餘蘊」。《宋史·道學傳》說：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

¹⁴ [清]呂留良：〈東皐遺選序〉，《呂晚村先生文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41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5，頁 17a。據呂留良〈孫子度墓誌銘〉，澄社成立於崇禎 11 年戊寅，見[清]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卷 7，頁 6a。

¹⁵ 《宋史·道學一》列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附張戢、邵雍，〈道學二〉列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尹焞、楊時、羅從彥、李侗，〈道學三〉列朱熹、張栻，〈道學四〉列黃榦、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427-430，頁 12709-12792。

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贊《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帝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¹⁶

〈道學傳〉列第一階段「道為政教、職業、講習、日用不知」，涉及到「儒」在先秦的源起問題，也是筆者「儒的源流研究」中關於「源」的焦點。此一問題，自康有為、章太炎討論後，漸成為 20 世紀以降「儒」的討論的焦點。近人討論，或從巫覡宗教、或從社會階級、或循歷史政治，大致不能出康、章及胡適以降幾位碩學大師所論的範疇，其餘或略有新意，限於篇幅，暫不展開。

〈道學傳〉討論「儒」歷史發展的第二階段，循歷史眼光解釋「道」脫離政治，肇因文王、周公既歿，「道」已無法在政治上「漸被斯世」。孔子有德無位，只能傳其說，「道」就漸獨立於政治，而成為儒者「以道統自期」的理想。換言之，「道」的開展已脫離了一種「自天子至於庶民」皆融匯於「道」之中的狀態，而產生出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的士階層——儒——站在一個稍稍抽離於政治的位置（「孔子有德無位」），對「道」加以述說、解釋、闡明、批判。此階段「儒」觀念中的「道」既是「天人之道」或稱「天下之達道」，也包括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道」，更是儒者傾心嚮慕的君子之「道」。據〈道學傳〉之意，其內容皆明載於《禮記·中庸》。¹⁷

¹⁶ 〔元〕脫脫等：《宋史·道學一》，卷 427，頁 12709-12710。

¹⁷ 《禮記·中庸》「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等文字。〔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於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5 冊，卷 52，頁 1a、18b；卷 53，頁 1b。

第三階段，〈道學傳〉作者認為兩漢而下儒者論「道」弗精弗詳，讓異端邪說（釋、老）興起；至第四階段，宋儒得聖賢不傳之學，加以闡發讓「道之大原出於天」之理灼然無疑，¹⁸才扭轉漢、唐的局面。換言之，宋代道學所講的「道」，已不盡是先秦時期澤被朝廷百姓的「道」，而是討論陰陽五行、理一分殊、天人性命的「道」。

《宋史》為元人所修，而「儒」的討論在元代以前已討論了千百年。以晚近而言之，南宋宣揚事功的陳亮（同甫，1143-1194）批評朱熹（元晦，1130-1200）標榜的「儒」家道統。陳亮批評「道統說」有如「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¹⁹又區別「人道」與「儒道」，認為前者先於後者，²⁰觸及問題根源。因歷史上自孔子確立「儒」的流品而首倡「仁」。「仁」字，《說文解字》釋為「親也」，〈中庸〉「仁者，人也」鄭玄（康成，127-200）注稱：

「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²¹

鄭玄之意，是說「相人偶」的「人」字，用為動詞，故釋為「意相存問」。²²「人」與「儒」作為概念範疇，相涵攝的關係至深。

《宋史》由蒙古人脫脫（或譯托克托，1314-1356）編撰，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出於非漢族人之手的漢族朝代史。滿清入關，多次議修《明史》，以宣示明朝的終結。至康熙 18 年（1679）始正式設立史館，任命徐元文（公肅，1634-1691）為總裁。徐因黃宗羲（梨洲，1610-1695）曾編《明文海》，且對史法、曆法、掌故均熟諳，擬召聘，宗羲以守節拒絕，²³即推薦弟子萬

¹⁸ 〔漢〕董仲舒：〈天人三策〉，收於〔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卷 56，頁 2518-2519。

¹⁹ 〔宋〕陳亮：〈又乙巳秋書〉，收於〔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卷 28，頁 352。

²⁰ 〔宋〕陳亮：〈又甲辰秋書〉，收於〔宋〕陳亮著，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下冊，卷 28，頁 341。詳參鄭吉雄：《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第 2 章〈陳亮的事功之學〉，頁 83-89。

²¹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 52，頁 18b。

²² 故「相」字讀為「互相」之相，非「輔相」之相。

²³ 全祖望（謝山，1705-1755）〈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藹先以詩寄公，從吏就道。公次其韻，勉其蒞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清〕全祖望著：〈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鮚埼亭集內編》，收於〔清〕全祖望著，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 11，

斯同（季野，1638-1702）北上任事。對漢族士大夫而言，參與修史存在兩難：異族政權主導修《明史》，涉及民族大義與歷史是非，既不能拱手讓與滿清或無識之人，又怕當事者因參與而失節。斯同北上前，宗義特別告誡勿獻策於朝廷。但事實上宗義也有實質參與修史。²⁴像《明史》應否立「理學傳」，在史館曾被討論。宗義也毫不含糊地寫了〈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反對在《明史》中設立「理學傳」。²⁵

宗義在信中首列四「款」，批評史臣見識淺陋，毫無義理判斷能力，致同異之論多不允當。第一款指出所列程朱一派學者大多未嘗發明程朱義理，自不能屬於程朱譜系：

薛敬軒、曹月川……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滴骨程、朱也？如整菴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又言陳克庵、張東白、羅一峰、周翠渠、張甬川、楊止庵，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²⁶

據參與《明史》修撰的毛奇齡（西河，1623-1716）〈折客辨學文〉的記述，《明史》各篇傳記的分工，除依專攻領域分派外，亦採取「拈鬪」方式決定，²⁷難怪萬斯同譏嘆此種制度「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²⁸宗義說：

頁 220。

²⁴ 黃宗義〈餘姚縣重修儒學記〉：「念陽明之學，今時間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清〕黃宗義：〈餘姚縣重修儒學記〉，《南雷詩文集》上冊，收於沈善洪主編：《黃宗義全集》第 10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34。按：毛奇齡〈辨聖學非道學文〉提及奇齡與史館總裁於陽明思想頗有辯論，或即宗義所謂「間有異同」。參〔清〕毛奇齡：〈辨聖學非道學文〉，《西河集》，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22，頁 3a-b。又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公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撒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宋史》別立〈道學傳〉為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眾，遂去之。……史局依之資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為考證。」〔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頁 223。

²⁵ 請注意：從信的標題看，《明史》要立的是「理學傳」而非「道學傳」，宗義信中卻常混稱二名。

²⁶ 〔清〕黃宗義：〈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南雷詩文集》上冊，頁 219-220。

²⁷ 〔清〕毛奇齡：〈折客辨學文〉，《西河集》，卷 120，頁 13b。

²⁸ 〔清〕方苞：〈萬季野墓表〉，收於〔清〕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卷 12，頁 334。

蓋諸公不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視為操戈入室之事。

必欲以水濟水，故往往不能盡合也。²⁹

第一款指責館臣混淆了程、朱義理系統，第二款則批評他們在陸、王義理系統上犯糊塗。他首先說館臣「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可「姑置不論」，說「象山、慈湖例入〈儒林〉」，³⁰卻不知楊簡（慈湖，1141-1226）在《宋史》就是在〈道學傳〉而非〈儒林傳〉；論及羅洪先（念菴，1504-1564）則否認其為陽明私淑，卻稱其學得力於陳獻章（白沙，1428-1500）。宗義引述錢德洪（緒山，1496-1574）之言，稱「念菴」在於陽明「稱門人」是當時「定論」，感嘆執筆者竟「不知白沙、陽明學術之異」，³¹又不明史法：

又言先師戡山益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列儒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既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為道學，則與前例異矣。今於高、顧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戡山則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高、顧功名，豈不盛乎？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³²

宗義揭示史筆準則，指出傳統史家並不將董仲舒、文天祥（1236-1283）一類有綜合性偉大成就的人物錄入儒林、文苑、忠義等個別門類，而是單獨立傳。個別門類收錄的是「一節之士」，亦即只在某一方面有優異表現者。而史傳中儒林、文苑、忠義等各門類，只依主題區分，並不反映價值高低。《明史》館臣則儼然將「道學」視為居於「儒林」之上一類，³³這就造成史書體裁的混亂。將高攀龍（景逸，1562-1626）、顧憲成（涇陽，1550-1612）入「道學傳」而將陽明（守仁，1472-1529）、戡山歸入「名卿列傳」，如此分判，難道高、顧二君子在政治功業上不如陽明、戡山？由此引申，陽明、

²⁹ 〔清〕黃宗義：〈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頁220。

³⁰ 同上註。

³¹ 同上註，頁221。

³² 同上註。宗義稱：以朱熹功名，《宋史》亦不列入名卿。意即元人修史，亦知朱子雖有功業，主要貢獻卻在儒學。

³³ 依此信〈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題目，宗義此段文字所稱「道學」實即「理學」。

戢山在理學方面豈不如景逸、涇陽？這一節既涉及義理分判，也涉及史法體裁。館臣無知，在人物歸類上即暴露其缺乏識見。

宗義由第一款指出《明史》「理學傳」以程朱為正統，視之為座標，雖勉強說「是矣」，實則深致不滿。第二款「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承第一款的語氣，雖說「姑置不論」，但不滿之情更溢於言表。又睹館臣將陽明、戢山擯除出「道學傳」而置於「名卿列傳」，實在太豈有此理。論及第三款，宗義忍不住直指館臣對姚江學脈的無知，說：

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戢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無迺刻乎！³⁴

這裡宗義講的「浙東學派」指的姚江學派，和稍晚章學誠筆下的浙東學派無關。宗義之意，王學固有「末流」，但「末流」之弊自不動搖姚江學術的精醇與地位。第四款再承這一主線，批評館臣門戶之見太過：

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所載〈道學〉，即如邵堯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盡同於程子也。又言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筆者按：朱子云：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³⁵

宗義認為學術思想有同有異，最為平常，儘管《宋史》久為人所詬病，邵雍不因程頤的批評，而被擯除於〈道學傳〉外；游酢（廣平，1053-1123）、楊時（龜山，1053-1135）、謝良佐（上蔡，1050-1103）等程門弟子未必無弊，亦不因朱子的批評，而不能列於程子門牆。最後，宗義仍回歸史筆原則，直指「儒」是流品之極，故傳統史書稱〈儒林〉實屬恰當；另立〈道學〉，則屬於元人陋見：

夫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

³⁴ 〔清〕黃宗義：〈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頁221。

³⁵ 同上註，頁221-222。

也。儒林亦為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為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為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為「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為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於道」。志道可以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聖朝秉筆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師法元人之陋，可乎？某竊謂「道學」一門，所當去也，一切總歸「儒林」，則學術之異同皆可無論，以待後之學者擇而取之。³⁶

宗羲的意見看似復古而實非，因為「儒」的內涵在歷史上早已確立，「儒林」藉此而獲得價值與意義也是理所當然。相對上，「道」只是追求理想之境，而非價值確立之稱。宗羲本於他所認知的史學原則，「道學」實難與「儒林」相提並論。誠如姜希轍（二濱，?-1698）為黃宗羲《曆學假如》撰〈序〉說：

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後之儒者懲玩物喪志之害，於是孤守此心，一切開物成務之學，面牆不理。此吾夫子所謂小人儒也。³⁷

這是對於晚明沿心學末流從事講學的儒者十分深刻的批評。不過至清中葉阮元（芸臺，1764-1849）〈擬國史儒林傳序〉卻提出和宗羲截然不同的見解：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

³⁶ 〔清〕黃宗羲：〈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頁222-223。

³⁷ 〔清〕姜希轍：〈序〉，收於〔清〕黃宗羲：《曆學假如》，收於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9冊，頁282。

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閤合周道也。³⁸

照阮元之說，《宋史》分〈道學〉、〈儒林〉為二，看似創新，實暗合《周禮》。我們知道《周禮》描述周朝官制嚴密而周備，從歷史發展角度看，理想成分似多於實錄成分。阮元引以為據，未必允當，此其一。阮元稱「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顯然將「六藝」理解為《六經》，而非鄭玄《注》的「禮、樂、射、御、書、數」。既為《六經》，何為「道」？何為「藝」？二者如何區分？又如何能合？顏、曾、游、夏，學於孔子則一，因性情興趣不同，容或有「以道兼藝、以藝兼道」之異。如今如何能以「道學、儒林」對照出「師、儒」、「道、藝」的區別？此中實語焉不詳，此其二。即使逕以「六藝」為《六經》而論，則以道兼藝，或以藝兼道，必不離於儒家經典。《宋史·道學傳》所列諸儒，如張載著《正蒙》，是解《易》之書，或可稱「以道兼藝」；周敦頤、邵雍未嘗治經典，可稱「以道兼藝」或「道與藝合」嗎？此一節，阮元將如何能自圓其說？此其三。《宋史·儒林傳》中所列諸儒，不以經學鳴世者亦甚多。如此，能符合「以藝兼道」嗎？此其四。由此觀之，阮元以「道學、儒林」二傳區分，比附《周禮》「師、儒」之別，說是「閤合」，遽睹似乎合理，諦審之則理據難洽。³⁹

平情而論，《宋史》將〈道學〉獨立出〈儒林〉之外，從史學義例上講並非特例，宗義高舉「儒」的本義來貶斥「道學」之名也未必公允。《史記》首立〈儒林傳〉，《漢書》承之，自此「儒林」成為定名定例。早在明初，宋濂（景濂，1310-1381）領銜編修《元史》，其〈儒學傳·序論〉已說：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二，以經藝顯門者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然儒之為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

³⁸ [清]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擘經室一集》，收於[清]阮元著，鄧經元點校：《擘經室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2，頁36-37。

³⁹ 並參傅凱瑄：《近代中國學界對「儒」的論爭（1840-1949）》，第2章〈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與《周禮》師、儒之分〉，頁35-37。傅君見解與筆者略有不同。

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⁴⁰

宋濂是明初的文學家，特別注意「文章」，可以理解。這段話特別提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顯然不贊成〈文苑〉從〈儒林〉中獨立出來。要知道「文苑」所列文士，固亦儒林中人，但夷考史實，將〈文苑〉從〈儒林〉獨立出來，始於范曄（蔚宗，398-445）《後漢書》，上承《史》、《漢》之後，已從〈儒林〉中派分另一新類。宋濂謂「以經藝顯門者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分」的理據既在於此，而且歷史上也明明就分了，如今說「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豈不自相矛盾？「文苑」既可從「儒林」中獨立出來，何以「道學」必定不能呢？由此可見，「儒林、道學」分合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未必只有一種答案。

四、明末以降文學對儒學的針砭與滋潤

全祖望評價明代中葉以後儒林學風：

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為極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⁴¹

此節說明明代儒林實有嚴重的乾枯之病。用今天的話說，明中葉以後「心學」獨盛，學術過度向「心學」傾斜，其他領域知識必皆枯槁。明末儒學就像過度偏食導致嚴重營養不良而奄奄一息的病人。束書不觀，則不能從古典經籍中汲取資源以豐富自身學養；學究習氣，又局限了人文學亟需的性靈浸潤。此即「空疏」所由來。中國傳統「文以載道」精神，正提醒我們，儒術從來重視文藝滋養，而文學家也強調根柢經史。漢魏騷賦與劉勰（彥和，約 465-約 522）《文心雕龍》就是最佳典範。即使《元史·儒學傳·序論》區分儒林與文苑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也並不代表文章與經術之間可以一刀兩斷。宋濂所謂「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旨意正在於此。儒學以《六經》為主，開拓出文、史、哲，經史子集之間，有似烹飪者調和百味，儒學因而不再生寡淡，文史之學也更饒餘韻。阮元曾書楹聯

⁴⁰ 〔明〕宋濂等著：《元史·儒學一》第 3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卷 189，頁 4313。

⁴¹ 〔清〕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鮚埼亭集外編》，收於〔清〕全祖望著，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16，頁 1059。

「五嶽圭稜，河海氣象；六經根底，文史波瀾」，⁴²生動地說明了《六經》與文史之學互為資源，正如五嶽之於山河大地氣象相依存的關係。「文史哲不分家」一語，從淺處看是強調人文學知識的整體性，從深處看則透露不同學術領域的多重聯繫，端看學者如何窮幽索隱，將潛藏其中的關係勾稽出來，交互攻錯，以達致一加一大於二的協同效應（synergy）。用飲食為喻，正如攝取不同食物，獲得多元養分，促進人的健康，儒者也應該吸納不同領域知識豐富儒學。由此而看，明末以降，學者——包括文學家——深刻反省儒林學風問題，實是以多元知識重新充實儒學。先是歸有光（震川，1507-1571）直指求道者應該歸本經學：

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⁴³

經學深微，用「簡而易」形容《六經》之言，未必允當。不過歸震川的用意，更多是鼓勵學者不要甫開卷《六經》就畏難而卻步，應該從淺處去親近經典。而溯源經典，對儒者而言，確是提振儒學的不二法門。要知道經典屬於綜合性知識，《詩經》的隱喻寄託，《周易》的抽象玄思，《春秋》的褒貶決斷，皆能神明吾心，對於知性思維活動有莫大刺激作用。震川之語，實取文學閱讀與創作為經驗，著眼於經典與讀者的雙向溝通，洵為求道之資。⁴⁴又說：

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⁴⁵

⁴² 此為楹聯，無書籍資料。

⁴³ 〔明〕歸有光：〈示徐生書〉，收於〔明〕歸有光著，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7，頁150-151。

⁴⁴ 歸有光文章名動一時，晚明文壇巨子。直至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仍提及：「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為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為全篇結構，若者為逐段精彩，若者為意度波瀾，若者為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為古文祕傳。」〔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39。實齋所見五色圈點本《史記》是否出自震川之手，難以考究，但亦可見震川文名之盛至清中葉不衰。

⁴⁵ 〔明〕歸有光：〈送何氏二子序〉，收於〔明〕歸有光著，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上冊，卷9，頁195。

「聖人之道」載於《六經》之義，實遠承自韓愈（退之，768-824），亦即古文家所謂「文以載道」。以「道」為標榜，既符合道學家義理，亦與經學家言論相合。「道亦何容講哉」一語，儼然即《宋史·道學傳》「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之意，亦無異於顧炎武（亭林，1613-1682）〈與施愚山書〉所謂「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⁴⁶而錢謙益（牧齋，1582-1664）亦說：

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⁴⁷

牧齋博通經史詩古文辭，其所論與歸有光如出一轍。他指出「儒林、道學」不能區分，實為梨洲言論的先聲；又特別提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對經學的重要性，更提醒治經學的人不能不究心於歷代注解傳統的業績，其論點立體而有洞見。他又說：

《六經》之學，淵源於兩漢，大備於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誠亦有之，然其訓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聖賢之門猶未遠也。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為宗主。……漢不足，求之於唐；唐不足，求之於宋；唐、宋皆不足，然後求之近代，庶幾聖賢之門仞可窺，儒先之鈐鍵可得也。⁴⁸

牧齋不愧一代儒宗，此一言論深具洞察力，唯有推極本源，才能怡然理順地將經典後世層累的解釋、依時代先後，逐層解剝，臚列新義舊義，加以比較，足以豐富讀者心靈，既能滋養調劑人文靈性，亦能捕捉經典新舊義理。⁴⁹較錢謙益略晚，與侯方域（朝宗，1618-1655）、汪琬（苕文，1624-1691）

⁴⁶ [清]顧炎武：〈與施愚山書〉，《顧亭林詩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76年），卷3，頁62。

⁴⁷ 此文撰於崇禎12年（1639）11月。[清]錢謙益：〈新刻十三經注疏序〉，收於[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28，頁851。

⁴⁸ [清]錢謙益：〈與卓去病論經學書〉，收於[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下冊，卷79，頁1706。

⁴⁹ 陸隴其（稼書，1630-1692）《三魚堂日記》康熙20年（1681）11月20日記朱彝尊（竹垞，1629-1709）有類似的看法：「會朱竹垞，因留宿。竹垞言……宋元諸儒經解，

同時且齊名的魏禧（冰叔，1624-1681）則透過揭示黨派紛爭，譏諷儒門自相分裂的可鄙：

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為學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于聖賢之道而已。⁵⁰

此言深中儒林之病，儒者既標舉「道」為真理，自不應互相攻訐。理學家雖言有體有用，既重視「體」多於「用」，在「體」上也各具獨見。如聶豹（雙江，1487-1563）言「歸寂」則以「寂」為「體」，⁵¹羅洪先言「主靜」則以「靜」為「體」，⁵²戴山言「慎獨」則以「獨」為「體」，⁵³此即魏禧所說的「各有所得力之處」，各有宗旨而互不矛盾。同在士林，講學者與不講學者相攻；同為講學，則程朱、陸王甚至浙中與江右彼此相攻，從「求道」的角度看，有害無益。錢謙益、魏禧能有如此明達的洞見，因明代文壇，前後七子提倡復古、擬古，有僵化之病，引起晚明性靈派文人抗擊。文學貴在創作，勇於趨新，較諸嚴肅的經學、理學，氣氛更為活潑。文學家高舉反擬古的旗幟，思想上即無包袱。儒學發展至明末，獲得文學家的廣泛

今無人表章，當日就湮沒。又言程朱雖妙，然有日月必有眾星，有河海必有細流。今諸儒一見與程朱異，便以為得罪先儒，如《詩》之〈鄭風〉，亦不敢齒及古注疏，所以議論最難。蓋竹垞之學，記誦辭章之學也。」朱彝尊將所宗主的學問視為日月，至少將其他異說視為眾星。有此一喻，即可見胸懷開闊，能包容異見。陸氏評朱氏之學為「記誦辭章之學」，似微有輕視之意。〔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559冊，卷8，頁15a-b。

⁵⁰ 〔清〕魏禧：〈重興延陵書院記〉，《魏叔子文集外篇》，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08冊，卷16，頁39a-b。

⁵¹ 黃宗義《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二·貞襄聶雙江先生豹》指出「歸寂以通天下之感」是雙江宗旨，釋曰：「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清〕黃宗義：《明儒學案》上冊，收於沈善洪主編：《黃宗義全集》第7冊，卷17，頁428。

⁵² 羅洪先〈答羅岳鰲〉：「應而未嘗動，本體，以其順應也。不得於心而有思者，亦本體也，以其澄然運用，而不容已者也。」〔明〕羅洪先：《念菴文集》，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5冊，卷2，頁13b。

⁵³ 劉宗周：「孔門約其旨曰『慎獨』，而陽明先生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可謂先後一揆。慎獨一著，即是致良知。」〔明〕劉宗周：〈證人會約書後〉，收於〔清〕劉宗周著，戴璉璋、吳光主編：《劉宗周全集》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頁589。

關注，實為大幸。因中國傳統文學家必以創作為依歸，鮮少像現代學者僅將批評、理論抽離，絮絮討論，對創作一竅不通。大凡從事創作者必具靈活思維，不拘執於成局，因此文學家觀察儒學之病，有時較諸困守儒學局中人更為明察。誠如萬斯同〈與錢漢臣書〉所言：

經者，文之源也；史，即古文也。⁵⁴

史筆寓褒貶於敘事，事理清晰，辭氣遠鄙倍，是為上乘，其意近於古文「骨、氣」之相須。姚鼐（姬傳，1732-1815）說：

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⁵⁵

又說：

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為其學者，以為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為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⁵⁶

桐城派上承八大家緒餘，重視文以載道。求「道」的大方向，實無異於道學家。姚鼐「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得也」一語，異常生動地道出學者的痼陋。由此可見，清中葉經學家討論「義理、考據、辭章」的先後關係，辭章之學獲得經學家關注，遠有來歷，可追溯至明代。其時揚州學者如重視性靈的焦循（里堂，1763-1820）、⁵⁷駢文冠冕

⁵⁴ 〔清〕萬斯同：〈與錢漢臣書〉，《石園文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15冊，卷7a，頁6b。

⁵⁵ 〔清〕姚鼐：〈程綿莊文集序〉，《惜抱軒文集後集》，收於〔清〕姚鼐著，劉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1，頁268。

⁵⁶ 〔清〕姚鼐：〈復蔣松如書〉，收於〔清〕姚鼐著，劉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卷6，頁95。

⁵⁷ 誠如錢賓四先生指出：「里堂論學極多精卓之見，彼蓋富思想文藝之天才，而溺於時代考據潮流，遂未能盡展其長者。然即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與東原、實齋鼎足矣。」錢先生所謂焦里堂思想上之成就，包括從人智慧進化、心知之智能變而之於宜，以得其利，以釋人性之善，又強調「人之情能旁通」，較東原「去私」之說，尤為完密。又《論語通釋·釋異端》謂「執其一端為異端，執其兩端為聖人」，認為執一則不達於情之旁通。又《論語通釋·釋仁》闡發「仁」之義，謂「不使天下之學皆從己之學，不使天下之立達皆出於己之施。忠恕之道，至此始盡；聖人之仁，至此始大；一貫之指，至此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10章〈焦里堂〉，頁455-467。

的汪中（容甫，1745-1794），⁵⁸都兼為乾嘉經學潮流中的巨擘，為經學注入了文學的活水。儒學獲得更多文學的挹注，充滿生機。章太炎〈清儒〉一文卻對揚州文士惑亂經學表示深惡：

初，大湖之濱，蘇、常、松江、大倉諸邑，其民佚麗，自晚明以來，恣為文辭比興。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劉覽而無紀綱，其流遍江之南北。……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為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儒始交惡。而江淮間治文辭者，故有方苞、姚範、劉大櫟，皆產桐城。以效法曾鞏、歸有光相高，亦願尸程、朱為後世，謂之桐城義法。……陽湖惲敬、陸繼輅，亦陰自桐城受義法。其餘為儷辭者眾，或陽奉戴氏，實不與其學相容（原注：儷辭諸家，獨汪中稱頌戴氏，學已不類。其它率多辭人，或略近惠氏，戴則絕遠）。夫經說尚樸質，而文辭貴優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以娶蕩自喜，又耻不習經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為瑰意眇辭，以便文士。⁵⁹

太炎守專門漢學，其言亦未盡公允。方苞（望溪，1668-1749）是桐城派先驅，其「義法」之說實發展自萬斯同「事信而言文」的史筆教誨，以《周易》「言有物」、「言有序」闡釋「事信」、「言文」兩觀念，而發展出「義法」的理念，⁶⁰即文學與經史相通的最佳例證。由萬斯同與方苞學術因緣考察，太炎據皖派經學觀點，貶抑揚州學派兼採文學與經學方法，似非大方之論。因為經學本屬於綜合性知識，天文、地理、政治、歷史、訓詁、義理無不具備，儒者倘能沿經學正統方法，兼採文學、史學之長，實屬學術發展坦

⁵⁸ 汪中駢文，如〈自序〉一首，沉鬱頓挫，代畢沅（秋帆，1730-1797）作的〈漢上琴臺之銘〉則空靈高逸，各有所造，亦不愧於六朝佳韻。

⁵⁹ 章太炎：《檢論·清儒》，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念馳編訂：《章太炎全集》第3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483-485。

⁶⁰ 《周易·家人·象傳》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又〈艮〉卦六五爻辭「艮其輔，言有序，悔亡」。〔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4，頁16b；卷5，頁28b。康熙37年（1698）方苞年三十一，見萬斯同。斯同時年六十一，勸方苞「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又以「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指示「史之難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後方苞參《易傳》「言有物、言有序」而發展出「義法」之說。參〔清〕方苞：〈萬季野墓表〉、〈讀子史·又書貨殖傳後〉，收於〔清〕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冊，卷12，頁332-333；卷2，頁58-59；並詳鄭吉雄：〈評青木正兒博士《清代文學評論史》〉，《近三百年歷史、人物與思潮》（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年），頁219-223。

途。宋明理學標舉義理，偏重德性之知，轉視經典文獻考索為近於「聞見」，經典價值反遭斷傷。宋明儒擅長義理，清儒擅長考據，各擅勝場。而清中葉學者則在考據、義理二者之外，特納入「辭章」之學，鼎足為三，深有遠見。姚鼐標舉辭章與義理、考證並立，見於〈復秦小峴書〉：

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一途之中，歧分而為眾家，遂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徑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為，而訾其所不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為善。若如鼐之才，雖一家之長，猶未有足稱，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傑興焉，盡收具美，能驅末士一偏之蔽，為群材大成之宗者，鼐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陳之於閣下而已。⁶¹

姚鼐之前，戴震（東原，1724-1777）實已有相同論點。乾隆 20 年（1755）戴震〈與方希原書〉：

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者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⁶²

段玉裁（茂堂，1735-1815）《戴東原集·序》記東原口語：

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昇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轎中人也。」⁶³

英時師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中說：

東原中年時代既與考證派沆瀣一氣，他的論學觀點便逐漸發生了

⁶¹ 此文撰於嘉慶元年（1796）。〔清〕姚鼐：〈復秦小峴書〉，收於〔清〕姚鼐著，劉季高標校：《惜抱軒文集》，卷 6，頁 104-105。

⁶² 〔清〕戴震：〈與方希原書〉，《東原文集》，收於〔清〕戴震著，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卷 9，頁 375。

⁶³ 〔清〕段玉裁：《戴東原集·序》，收於〔清〕戴震：《戴東原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434 冊，頁 1a-2a。

變化。段玉裁嘗記其言曰：「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三者皆庶得其源。」茂堂始向東原請業在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原注：一七六三），已在東原入都九年之後。此處東原將義理、考覈、文章加以平列，並謂三者各有其源，顯然和他早期的見解有了分歧。⁶⁴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記戴震之語：

義理即考覈、文章二者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吾前言過矣。⁶⁵

從戴震思想發展軌跡考察，他將「義理」置於二者之先，認為它是考覈、文章之源，三者不再平列，此屬晚年定論。就事論事，目前未有鐵證支持姚鼐之論抄襲自戴震；⁶⁶但可以肯定的是，戴震的言論全屬個人領悟。從一個寬鬆的角度看，將義理、辭章、考據視為學問三大支柱的見解，戴震亦非最早。明初王禕（子充，1322-1373）〈原儒〉已說：

秦、漢以下，儒之名雖一，其學則析而為二（筆者按：當作「三」）：有記誦之學，有辭章之學，有聖賢之學。⁶⁷

「記誦」近於「考據」，「聖賢」近乎「義理」，與辭章之學並立為三。王禕官聲甚佳，但就學術而言，並無甚傑出著作，竟有如此識見，粹然醇儒又焉能廢棄辭章之道？不過戴震凸顯義理為考覈、文章之源，其持論更為立體。以後曾國藩（滌生，1811-1872）發揚戴、姚論點，加入「經濟」，以「義理、詞章、經濟、考據」並列，將明末以來經濟、經世的學問重新納入「儒」的知識範疇。⁶⁸

⁶⁴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年），頁112。

⁶⁵ 〔清〕段玉裁編：《戴東原先生年譜》，收於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0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頁42a-b。余英時師：「此語不易定其確在何年，但至早在一七七六，至遲在一七七二，要之不出此五、六年之內耳。」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頁113。

⁶⁶ 按：《清史稿》本傳稱許姚鼐「其論文根極於道德，而探原於經訓」，則所遵循的途徑與方苞相同。趙爾巽等著：《清史稿·文苑二·姚鼐》第44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485，頁13395。

⁶⁷ 〔明〕王禕：〈原儒〉，《王忠文公集》第1冊，收於〔清〕胡鳳丹輯：《金華叢書》第27函，收於嚴一萍輯：《百部叢書集成》第95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卷1，頁35b。

⁶⁸ 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上「問學」類：「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

明末講學的虛病既已令儒林疲敝，當務之急，是為儒學注入源頭活水。而如本節所論，重新審視「辭章／文章」價值對儒學尤其是經學有裨益，實是康莊大道。《明文海》的編者黃宗羲在〈李杲堂文鈔序〉中說：

余嘗謂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今見其脫略門面，與歐、曾、《史》、《漢》不相似，便謂之「不文」，此正不可與於斯文者也。濂溪、洛下、紫陽、象山、江門、姚江諸君子之文，方可與歐、曾、《史》、《漢》並垂天壤耳。蓋不以文為學，而後其文始至焉。⁶⁹

理學家文章是否能與《史》、《漢》、韓、歐並垂天壤，學者自有公論。但宗羲深信學問德行充實所至，文章必亦垂範。此即《周易·革》卦「君子豹變」、「大人虎變」之義，⁷⁰亦《文心雕龍·情采》「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之理。⁷¹但話說回來，宗羲倡議「不以文為學」，過度尊經而貶抑子、史、集，亦未為允當。儒者可以「以經為學」，斷無道理不可以「以文為學」，畢竟文學自有造境，和經史之學的關係可以多元。宗羲又說：

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全憤激許，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皋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為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⁷²

孔門為文學之科。」卷下「文藝」類：「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清〕曾國藩著，〔清〕王啟原輯：《求闕齋日記類鈔》，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559冊，卷上，頁8a；卷下，頁6b-7a。

⁶⁹ 此文撰於戊午年（1678）。〔清〕黃宗羲：〈李杲堂文鈔序〉，《南雷詩文集》上冊，頁28。

⁷⁰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5，頁19b-20a。

⁷¹ 〔南朝宋〕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7年），卷7，頁1a。

⁷² 〔清〕黃宗羲：〈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南雷詩文集》上冊，頁34。

戴山強調「盈天地間皆氣」，⁷³宗義承師說，《明儒學案·序》中言「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宇宙萬物人類只是一氣之流行，實是宗義的信念，⁷⁴他說「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時，實不僅僅將「文章」視為純文學創作，而是視為深藏於古今典籍之中的普遍之人性光輝的恢弘體現。明代多位文壇鉅子開啟端緒，清代學者加以敷揚，故入清以後，儒林對辭章之學態度更為明達開擴。如陸隴其《三魚堂日記》戊午閏（三）月初一記：

接吳準菴薦舉呈稿，內有「理學入程朱之室，文章登韓柳之堂」等語，此非予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⁷⁵

隴其屬清代前期宗程朱一派學者中磊落之士，⁷⁶表揚程朱，兼能欣賞韓柳之文，此種襟懷，謀諸明代理學家實不多見。經術文章在清代儒林獲得發揚，在清初已見端緒，傳至揚州學者，更是大放異采。

五、儒林的史學經世

章太炎《檢論·清儒》稱萬斯同「獨尊史法」，⁷⁷故談清代史學，不能不著眼於浙東史學。黃宗義〈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天緯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閭扞邊者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為立功建業，別是

⁷³ 黃宗義《明儒學案·戴山學案》：「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清〕黃宗義：《明儒學案》下冊，收於沈善洪主編：《黃宗義全集》第8冊，卷62，頁890。

⁷⁴ 〔清〕黃宗義：《明儒學案·序》上冊，頁3。

⁷⁵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4，頁9b。

⁷⁶ 清初士林，宗程朱者多屬迎合滿洲帝王的利祿之徒，如魏裔介（貞庵，1616-1686）、李光地（榕村，1642-1718）之流；宗陸王者則多志節之士，如湯斌（潛庵，1627-1687）、李紱（穆堂，1673-1750）等。說詳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第7章〈李穆堂〉，頁261-269，「清初之朱陸異同論」。魏裔介識見庸腐，可參鄭因百師（騫，1906-1991）《龍淵述學》「龍淵里日鈔」、「清人稱宋人為丈」條，見鄭騫：《龍淵述學》（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頁375。

⁷⁷ 章太炎：《檢論·清儒》，頁483。

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⁷⁸

身為儒林首領的宗義檢討「儒」的言行，認為晚明儒林講學之風傾頹，實和政壇一樣腐爛，不待滿清高壓統治，自身已至於無可救藥。儒林將心思投入「語錄」、「講學」的結果，「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在各個領域中，史學最貼近現實，而清初史學，正是儒學知識寶庫中特別獲得高揚的領域。究其原因，在於國破家亡的刺激。晚明國事蝸蟻，促使士大夫以歷史精神回顧一朝治國經世文獻的結集；國家衰亡，迫使儒林思考國史保存的重要性；改朝換代，新政府修撰勝朝歷史，又促使前朝遺裔士人提振精神積極參與，以維護國史不滅。《莊子·知北遊》說「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⁷⁹清初儒者高揚史學，鼓勵學者關懷當世，無異將講學風氣的腐土，轉化為知識的春泥。「史學、經世」常一體兩面。正如王夫之（船山，1619-1692）說：

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⁸⁰

因經世目標在於救世，聚焦當代，而史學本非考古，而是現實的一連串延續——古代之歷史，亦即古人的當世；今日的時事，將成他年的史跡。明末有識之士蒐集有明一代文章，動機原無關乎史學，而是為了救亡圖存。其事始自馮應京（可大，1555-1606）《皇明經世實用編》28卷，以及陳仁錫（明卿，1581-1636）《八編經世類纂》225卷。馮氏深鄙晚明狂禪風潮，任湖廣監察御史期間以激烈手段對付李贄（卓吾，1527-1602）而獲罪；仁錫則為不願黨附魏黨而遭罷，均屬對萎靡士風深致不滿的士大夫。不久崇禎10年（1637）丁丑科進士陳子龍受二人影響而有述作，⁸¹翌年（1638）2

⁷⁸ 〔清〕黃宗羲：〈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南雷詩文集》上冊，頁433。

⁷⁹ 〔清〕郭慶藩編，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7下，頁733。

⁸⁰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後漢光武帝·一〇》，收於〔清〕王夫之著，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卷6，頁225。

⁸¹ 陳子龍官至南京兵科給事中。崇禎17年（1644）明亡，福王於南京即位，子龍上防守要策，不聽。翌年（1645）2月乞去；4月，多鐸攻陷揚州，史可法殉難，揚州屠城。子龍削髮為僧繼續抗清，後遭逮，投水而亡。參〔清〕張廷玉等著：《明史·陳子龍傳》第23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277，頁7096-7098。

月始與宋徵璧、徐孚遠（復齋，1600-1665）合編《皇明經世文編》，同年11月成書，⁸²以明朝開國迄編輯當年計二百七十年（洪武元年〔1368〕—崇禎11年〔1638〕）為斷限，全書凡五百零四卷，補遺四卷，以《文集》為單位，不以主題為單位，故只有書名、篇名，而各類主題文章則散落不同作者專書之下。所收錄諸家文集，明朝後半的文集收錄遠較前半的為多，收錄文章凡三千二百餘篇。鑑於編輯倉促，文章未分類。⁸³彙為一集，本意雖不在於發明史學，最後卻成為明代珍貴史料，陳子龍〈序〉云：

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擷華而舍實。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⁸⁴

據宋徵璧〈凡例〉稱「北摧勁虜，則詳于王威寧」，「倭奴抄掠，則詳於胡少保、戚總戎、唐荊川」云云。⁸⁵由此可見，《文編》有針對明代特定問題收錄文章。此其一。〈凡例〉又稱蒐錄「治體事功，人文國典」，以為「異日作史之資」，⁸⁶說明《文編》有備國史的目的。此其二。又強調「立言、實用」兼備，呼應「經世」主旨。此其三。《文編》具有批判性，如特收錄停礦稅、議論「遼餉」之議。此其四。編者不以人廢言，曾遭貶謫士大夫的奏疏文章亦收錄。此其五。六部官員（尤其首輔）作品收錄多，可能因明太祖罷丞相，此後內閣首輔更換頻仍的緣故。此其六。⁸⁷晚明邊防、邊餉、城堡、戰爭、差役等論述豐富，有價值。此其七。綜而言之，《皇明經世文

⁸² 陳子龍為前一年新科進士，徐孚遠至崇禎15年（1642）始中舉人，宋徵璧至崇禎16年（1643）才中進士。

⁸³ 筆者1997、1998年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對象即為《皇明經世文編》，以兩年時間，將五百餘卷重新分類、分冊，仍為筆者私藏，惜未有機會刊佈。特記於此，以待有緣。

⁸⁴ 〔明〕陳子龍：〈序〉，收於〔明〕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55冊，4b-5b。

⁸⁵ 〔明〕宋徵璧：〈凡例〉，收於〔明〕陳子龍等輯：《皇明經世文編》，頁10a。按：王威寧即王越（世昌，1426-1499），景泰2年（1451）辛未科進士，歷任監察御史、山東按察史、左都御史，並曾節制陝西、寧夏、延綏三鎮軍務，後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封威寧伯。戚總戎即戚繼光（元敬，1528-1588），出身軍戶，組戚家軍甚顯赫。

⁸⁶ 〔明〕宋徵璧：〈凡例〉，頁5a。

⁸⁷ 自明太祖廢宰相，以翰林院掌院學士為首輔，為實質之宰相。受制度影響，除張居正（江陵，1525-1582）在位十年較長外，宰輔替換十分頻繁，也是首輔人數眾多原因之一，造成明代政治不穩定。

編》揭櫫「經世」觀念，體製宏大；但因倉卒成書，且三位編者年輕且資歷均淺，致全書結構鬆散，包括選文時有重複，困難在於同一文章常兼有一個以上的主題，遂致混亂，故《文編》算是未成熟的作品。三位編者未必有盱衡古今、經緯世宙的雄圖大略，但關注時務，提出「經世」的主題以網羅一代文章，說明他們有意總攬政治、社會、民生等沉疴，也反映了明代士風未盡空疏，儒林中也有士人討論經國治邦實務，值得後人注意。⁸⁸

《皇明經世文編》的刊行在明末是大事，卻隨著陳子龍的自沉而終結，已難為世所矚目。而國家危亡之際，「國史」的保存，頓成大事。陳寅恪（1890-1969）指出，明末儒林跂盼修史、而自身亦以修史自命的大儒是錢謙益。⁸⁹錢氏雖始終未如願修撰《明史》，⁹⁰和他過從甚密的後輩黃宗羲《南雷集》中卻「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⁹¹鼎革之際很多為國殉難者的志節行跡，藉由宗羲撰著史傳而得以保存。宗羲的史學訓練甚早。他說：

自科舉之學盛，而史學遂廢。昔蔡京、蔡卞當國，欲絕滅史學，即《資治通鑑》板亦議毀之，然而不能。今未嘗有史學之禁，而讀史者顧無其人，由是而嘆人才之日下也。憶余十九、二十歲時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蓋兩年

⁸⁸ 以上據鄭吉雄 1998 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88-2411-H-002-031）「《皇明經世文編》研究報告」。

⁸⁹ 據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牧齋早歲成《太祖實錄辨證》五卷，《國權》一佰四亦載：「弘光元年乙酉二月壬申南京禮部尚書錢謙益求退居修國史。」陳氏云：「關於牧齋有志修史之材料頗多，如《有學集》壹肆〈啟禎野乘序〉引黃石齋臨死之言：『虞山尚在，國史猶未死也。』（原注：可參同書肆柒〈題程穆倩卷〉）：『漳海畢命日，猶語所知：虞山不死，國史未死也。』之語可見牧齋自負之一斑。」詳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第 5 章〈復明運動〉，頁 892。

⁹⁰ 陳寅恪先生又考論牧齋於順治 11 年甲午刊行《列朝詩集》，云：「牧齋〈自序〉云，『託始於丙戌』者，實因其平生志在修撰有明一代之國史。……牧齋於丙戌由北京南還後，已知此志必不能遂，因繼續前此與孟陽商討有明一代之詩，仿元遺山《中州集》之例，借詩以存史。其時孟陽已前卒，故一身兼採詩史之兩事，乃迫於情勢，非得已也。且〈自序〉中如『國朝』、『昭代』、『開寶之難』及『皇明』等辭，皆與其故國之思，復明之志有關。」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下冊，頁 1007。

⁹¹ 〔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頁 223。

而畢。……夫《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⁹²

其弟子斯同亦苦讀《二十一史》，實效法宗義，「獨尊史法」，可謂其來有自。⁹³此可見士風變化影響之大。⁹⁴宗義於康熙 7 年（1668）編《明文海》，⁹⁵收錄文章並不像《皇明經世文編》凸顯經世，而是全面蒐羅，有保存前朝文獻之意。而宗義撰史傳、輯史料以外，且有理論基礎。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說：

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戴山之緒。……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⁹⁶

宗義在康熙 5 年（1666）「復舉證人書院於越中」的四年前（1662）已刊佈《明夷待訪錄》，而且是在順治 10 年（1653）大致寫好的《留書》的基礎上踵事增華而成。⁹⁷其中共立十三個題目，⁹⁸涵括政體、選舉、財政、軍事、地方制度等各領域，每篇撰著體例均為三段論：

⁹² [清]黃宗義：〈補歷代史表序〉，《南雷詩文集》上冊，頁 80-81。

⁹³ [清]黃百家（主一，1643-1709）〈萬季野先生斯同墓誌銘〉說：「逮後康熙丙午（按：1666）、丁未（按：1667）間，余與先生及陳子夔獻讀書于鄞縣外之海會寺，見先生從人借讀二十一史，兩目為腫。己酉（按：1669）以後數年，又與先生讀書于越城姜定庵先生家，發其所藏，有明列朝《實錄》，廢寢觀之。」[清]黃百家：〈萬季野先生斯同墓誌銘〉，收於[清]錢儀吉纂，靳斯標點：《碑傳集》第 1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卷 131，頁 3907。

⁹⁴ 關於宗義於康熙 6 年恢復證人講會掀起的浪潮，詳鄭吉雄：《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第 3 章〈黃宗義恢復證人講會與尊史思想〉、第 4 章〈萬斯同的經世之學〉，頁 111-186。毛奇齡擅音律、詩詞、劇曲，未嘗治經學，也是在康熙 5 年在紹興聆聽梨洲講會後，才銳意研究經學。

⁹⁵ 初有 217 卷，約 360 餘家，稱《明文案》；至 1676 年書成，改題《明文海》，計 600 卷，分 28 文類（genre）。

⁹⁶ [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頁 219。

⁹⁷ 《留書》實為《明夷待訪錄》初稿，體例原只批判歷代制度，並未提新擘畫，其書未定，例如《留書》有〈封建〉篇明確主張恢復封建制度，《待訪錄》卻改題〈方鎮〉篇，稱「封建之事已遠」。至於年分的計算和疆域的描述，則保留晚明的痕跡。因此《待訪錄》已充分吸納《留書》，但又留下部分舊說未融。說詳鄭吉雄：《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第 3 章之「附錄：讀《留書》與《明夷待訪錄》隨劄」，頁 143-150。

(一) 源：先追溯立制之初的理想。

(二) 流與流弊：敘述歷史上該制度之變化及流弊。

(三) 對策：理想的方案。

由《待訪錄》一書可證宗義通貫經與史而倡言經世，非徒空言，而是有實際方案，難怪獲得顧炎武的高度讚許。⁹⁹尤有進者，中國史學傳統，必上溯至《春秋》之教。司馬遷（子長，約前 145-?）在〈太史公自序〉中縷述「余聞董生曰」藉以申論《春秋》褒貶之意。¹⁰⁰史學方法也部分來自經學的擴充。宗義說：

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為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為通鑑之目。¹⁰¹

短短數語，即將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三者的關係說清楚。又說：

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為□□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¹⁰²

⁹⁸ 「題辭」以下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下）、建都、方鎮、田制（一、二、三）、兵制（一、二、三）、財計（一、二、三）、胥吏、奄宦（上、下）。

⁹⁹ 〈顧寧人書〉（丙辰〔1676〕）：「頃過薊門，見貴門人具稔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見〔清〕顧炎武：〈顧寧人書〉，收於〔清〕黃宗義：《明夷待訪錄》，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945冊，頁1a-b。

¹⁰⁰ 〔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130，頁3297。

¹⁰¹ 〔清〕黃宗義：〈談孺木墓表〉，《南雷詩文集》上冊，頁269。

¹⁰² 同上註，頁270-271。

宗羲之意，治史者不但應該博覽，像荀悅（仲豫，148-209）《漢紀》和袁宏（彥伯，328-376）《後漢紀》雖未必與《史》、《漢》齊名，但要通知兩漢興衰，也不可不讀。中國傳統文人習俗，逝者已矣，下筆表墓、行狀、傳誌等，幾必隱惡揚善。而史家撰史，常採擷墓表傳誌，以為定評。最後諛墓文筆，載入史冊，賢奸難辨，是非相混，貽害不少。宗羲這段話即表述此意，而稱許傳主按實編年，不銜文彩的務實做法，表示自己撰墓表，於傳主亦無溢美之辭，以表示推重之意。宗羲的史法，經由赴京參與《明史》修撰的萬斯同傳揚，發生影響不小——儘管斯同興趣原在理學，棄理學而專心經史倒也有一段奇緣，¹⁰³但畢竟其毅力所至，赴京後一意經史，留下佳話，除活躍於京師，¹⁰⁴主持講會，《南雷集》中也保存了不少宗羲回答其詢問喪禮、史志的信，後來黃百家、全祖望、錢大昕（曉徵，1728-1804）均對萬斯同的博學強記，讚揚備至。¹⁰⁵

六、實學與事功：儒學新猷

前文論及，明清易代之際，儒者常提「實學」一詞。約三十年前辛冠潔、葛榮晉等合編《明清實學思潮史》，¹⁰⁶曾引起「實學」的討論。回顧明末，儒者群起提出「實學」、「經世」、「根柢」……，反面的如「衰」、「病」、「廢」、「虛」、「敝」、「俗」、「固／痼」、「無根」等等。「實學」詞義，應從此一時代背景理解。早在天啟年間，徐光啟（子先，1562-1633）已倡言「實」，說耶穌會士「實心、實行、實學」，隱然批判當時儒林之「虛」：

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踰實，絕去一切虛玄幻妄之說，……上窮

¹⁰³ 據李塨（恕谷，1659-1733）〈萬季野小傳〉：「踰數日，季野見下拜曰：『吾自誤六十餘年矣。吾少從黃梨洲，聞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陸子禪」，怪之，往詰其說，有據。同學因轟言予畔黃先生。先生亦怒。予謝曰：『請以往不談學，專窮經史。』遂忽忽至今，不謂先生示我正途也。』」（清）李塨：《恕谷後集》第2冊，收於〔清〕王灝編：《畿輔叢書》第24函，收於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第94輯，卷6，頁18b-19a。

¹⁰⁴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中記載在京公卿文士相聚的各種場合，偶亦有萬斯同的身影。

¹⁰⁵ 萬斯同之強記，可參〔清〕黃百家：〈萬季野先生斯同墓誌銘〉，頁3906；〔清〕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鮚埼亭集內編》，卷28，頁518-521；〔清〕錢大昕：〈萬先生斯同傳〉，《潛研堂文集》，收於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卷38，頁645-646。

¹⁰⁶ 陳鼓應、辛冠潔、葛榮晉主編：《明清實學思潮史》（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九天，旁該萬事。¹⁰⁷

徐光啟所言的「實」，植基於天文曆算等自然科學，近於方以智（密之，1611-1671）《物理小識》所謂「質測之學」。

上文引陳子龍《皇明經世文編·序》說「文士擷華而舍實」，又說「士無實學」，反覆批評文士的「不實」。陳子龍所講的「實」，則是主題的「經世」二字，而將《文編》所錄三千多篇文章翻閱一遍，即可知其中偏重的是針對政策、軍事、賦稅、農業、水利等政治社會民生議題進行討論的文章，則可見子龍所謂「實」，意在於此。而康熙 16 年（1677）丁巳黃宗羲〈學禮質疑序〉：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為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為實行也。¹⁰⁸

宗羲強調的實治、實行，也都聚焦於政治教化，不出「儒」的責任區。而專意發揚程朱學說的陸隴其，亦於同一年記陸元輔（翼王，1617-1691）來訪：

陸翼王……，又言桴亭、確菴，當婁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桴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¹⁰⁹

由此可推明末以降之「實」，關乎「時務」二字。那麼多學者以「實」字作為冠冕，道出明末清初儒林的「虛」病。誠如李紱評語：

平心論之，整菴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故，身為大臣，離事自全而已，能抗劉瑾乎？能誅宸濠乎？能靖粵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¹¹⁰

¹⁰⁷ [明]徐光啟：〈刻同文算指序〉，收於[明]徐光啟著，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2，頁80。

¹⁰⁸ [清]黃宗羲：〈學禮質疑序〉，《南雷詩文集》上冊，頁23。

¹⁰⁹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丁巳（1677）11月初四，《三魚堂日記》，卷3，頁29a。筆者按：「桴亭」即陸世儀（1611-1672），「確菴」即陳瑚（1613-1675）。

¹¹⁰ [清]李紱：〈心性說〉，《穆堂初稿》，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21冊，卷18，頁17b。

以「實學」與「虛說」相對，「虛」字含義，用施邦曜（爾韜，1585-1644）殉國前「慚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酬君恩」兩句話，¹¹¹最足說明。這兩句話反映晚明成千上萬「儒」者面對國家和社會危機，呈現出「集體失能」的奇觀。換言之，明代儒林自身的問題，不待滿洲高壓統治到來，早已病入膏肓，病到儒林有識之士不斷呻吟吶喊。這是今天我們回顧明清儒學史時所觀察到而且不得不承認的真貌。

明朝滅亡之速，剎那間將士大夫敲醒。黃宗羲和顧炎武不約而同地主張恢復封建、方鎮，¹¹²正是懲於 1644-1645 清兵從北京到南京摧枯拉朽的軍事力量，赫然發現原來中國地方貧弱至此。積弱的另一表徵是沒有救國人材，於是事功——尤其陽明事功——成為討論焦點。人材凋弊，當歸責於選舉制度，於是科舉、八股文、程朱學說亦成為討論焦點。

唐甄（鑄萬，1630-1704）《潛書》有〈性功〉篇。「性」即心性，「功」即事功。¹¹³唐甄認為儒者心性之學充盈，證之以事功，始為有體有用之學。〈兩權〉篇謂倘若只問事功不修心性，將如壯漢抱病十日，弱女子可扼而殺之；反之倘若只修心性而無能於事功，將如修行者導氣養神，遇寇盜亦將被殺。¹¹⁴〈良功〉篇說：

脩非內也，功非外也。自內外分，管仲、蕭何之流為賓，程子、朱子之屬為主；賓擯不入，主處不出；賓不見閭室之奧，主不習

¹¹¹ [明]錢駟：《甲申傳信錄》，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440 冊，卷 3，頁 15b。

¹¹² 顧炎武〈郡縣論一〉明白提出「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黃宗羲於順治 9 年（1652）撰《留書·封建》說：「自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國為夷狄所割者四百二十八年，為所據者二百二十六年，即號為全盛之時，亦必使國家之賦稅十之三耗於歲幣，十之四耗於戍卒，而又薦女以事之，卑辭以副之，夫然後可以僅免。乃自堯以至於秦二千一百三十七年，獨無所事，此何也？豈夷狄怯於昔而勇於今哉，則封建與不封建之故也。」分見 [清]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卷 1，頁 12；[清]黃宗羲：《留書》，收於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11 冊，頁 4-5。康熙元年（1662），黃宗羲將《留書》改寫為《明夷待訪錄》時，撰〈方鎮〉篇卻說：「今封建之事遠矣，因時乘勢，則方鎮可復也。」[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頁 24a。由此充分反映宗羲對封建、方鎮問題的措心。說詳鄭吉雄：《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

¹¹³ [清]唐甄：《潛書·性功》，收於 [清]唐甄著，吳澤民編校：《潛書：附詩文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上篇上，頁 19-22。

¹¹⁴ [清]唐甄：《潛書·兩權》，下篇下，頁 184。

車馬之利。自內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為生矣。¹¹⁵

唐甄認為「仲尼之道」應內外如一，不可偏廢。他再強調「一」：

德必一，脩必純。後儒得半誤以為一也，守固誤以為純也。……君子盡性之實功也，是乃所謂一也。儒者不言事功，以為外務。海內之兄弟，死於饑饉，死於兵革，死於虐政，死於外暴，死於內殘，禍及君父，破滅國家。當是之時，束身錮心，自謂聖賢。世既多難，己安能獨賢！是何異於半掩寢帳之見也，是乃所謂半也。彼自以為為己之學，吾以彼為失己之學。蓋一失，即半失矣，焉得裂一而得半也！¹¹⁶

自從《論語》記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後，¹¹⁷「一」就成為儒學的神聖數字。唐甄聚焦「一」來說明心性之學在聖賢之學中只占了「半」，必須加上另一半——事功才算完整。「裂一」不能「得半」，天天講「為己之學」，目睹成千上萬的人民飽罹戰禍，一籌莫展，最後自己也活不下去，無異於只放下半邊蚊帳，最後同受其害，這還算是聖賢之學嗎？黃宗羲也強調「一」，說：

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為道德，形於言則為藝文，見於用則為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為家，莫適相通乎！¹¹⁸

清初儒者反思「一以貫之」的「一」，和「性與天道」的「道」，發現原來宋、明儒都講偏了，側重了道德，卻忽略了事功，連藝文、節行都失去，導致學問「不通」。筆者說晚明儒學「偏食導致營養不良而奄奄一息」，其故在此。宗羲尤痛於「事功」與「道德」的對立，他回顧明代名臣的言與行說：

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¹¹⁹

¹¹⁵ [清]唐甄：《潛書·良功》，上篇下，頁52。

¹¹⁶ 同上註，頁53。

¹¹⁷ 《論語·里仁》，[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4，頁4b。

¹¹⁸ [清]黃宗羲：〈餘姚縣重修儒學記〉，頁134。

¹¹⁹ [清]黃宗羲：〈明名臣言行錄序〉，《南雷詩文集》上冊，頁52。

又說：

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陬，至於末造，清議不衰。¹²⁰

「事功」引起明末清初儒者注目，正緣於亡國之痛，大家不約而同又懷念起王陽明。魏禧〈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傳〉詳記晚明蔡忠襄（1586-1644）事蹟，序論曰：

世儒之談道學，其偽者不足道；正人君子，往往迂疎，狹隘弛緩，試於事，百無一用。即或立風節，輕生死，皎然為世名臣；一當變事，則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為三百年一人，洒北宋以來儒者之恥；又百數十年，而崑山蔡忠襄公起。¹²¹

稱讚陽明「以道學立事功」之語，與唐甄之意如出一轍。清初稱許姚江事功的，除了黃宗羲、魏禧、唐甄外，又如王源，提倡兵學，自謂「生平為文，論兵者居多」，¹²²又稱「生平最服姚江，以為孟子之後一人」，¹²³說：

（筆者按：宸濠之變）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是豈徒恃語言文字者所能辦？乃今之謗之者，謂其事功，聖賢所不屑也，其學術為異端，不若程朱之正也。其心不過欲蔑其事功，以自解其庸闇無能為之醜。¹²⁴

而批評王守仁，則多屬效忠滿清的學者，例如孫承澤（退谷，1592-1676），其《考正晚年定論》云：

¹²⁰ [清]黃宗羲：〈明名臣言行錄序〉，《南雷詩文集》上冊，頁53。

¹²¹ [清]魏禧：〈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傳〉，《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7，頁41a-b。同篇又記：「（思宗）問致治之要。對曰：『天下變亂，皆由民窮為盜。臣任撫綏，當使窮百姓有飯喫耳。然愛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僚屬心？願正己率屬，俾民不為盜，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害百姓，以成一己之名。』」[清]魏禧：〈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傳〉，頁49a。

¹²² [清]王源：〈復陸紫宸書〉，《居業堂文集》第3冊，卷6，頁14a。

¹²³ [清]王源：〈與李中孚先生書〉，頁9a-b。

¹²⁴ 同上註，頁9b-10a。

宋孝宗淳熙甲午為始，朱子是時年四十有五，其後乃始與陸九淵兄弟相會。以次逐年編輯，實無一言合於陸氏，亦無一字涉於自悔。……至謂守仁立身居家，並無實學，惟事智術籠罩，乃吾道之莽、懿。¹²⁵

此語純屬攻訐，「並無實學」四字語亦含糊。熊賜履（敬修，1637-1709）著《下學堂劄記》引蕭企昭（文超，1638-1670）《性理譜》冒陽明為賊；¹²⁶又著《閑道錄》，痛詆陽明；在其書獲清聖祖親題《熊學士閑道錄》置於御几，一時名重。¹²⁷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5附湯斌〈答書〉云：

姚江之學……近年有一二巨公昌言排之，不遺餘力，……可謂有功聖道矣。然海內學術之漓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學者固眾，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為能者也。¹²⁸

可見當時攻擊陽明事功之說，既關涉祿仕之途，也多隨聲附和、相尚以偽。王源〈與朱字綠書〉：

今之詆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而程朱之見推，實程朱萬世之大阨爾。……今之詆陽明者，行偽而品陋，識暗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干利耳，舉世若狂，以詆姚江為風氣，亦何足與深辨！¹²⁹

¹²⁵ [清]孫承澤：《考正晚年定論》（國家圖書館藏清錢馥抄本），無頁碼。

¹²⁶ 蕭企昭生卒年不詳，其祖父蕭丁泰為顧憲成學生，為萬曆29年（1601）辛丑科進士，因不依附魏黨而罷歸。崇禎初起用，歷四省六任藩伯，任上勞歿。

¹²⁷ 詳參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第7章〈李穆堂〉，頁261-269，「清初之朱陸異同論」。

¹²⁸ [清]湯斌：〈答書〉，收於[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5，頁7b-8a。

¹²⁹ [清]王源：〈與朱字綠書〉，《居業堂文集》第3冊，卷7，頁4b、7b。

據賓四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7章〈李穆堂〉「清初之朱陸異同論」所論，陸王與程朱在清初之爭，除了清流濁流的分野，與清初儒者懲於明代制舉之法及八股文取士之弊亦有關係。舉業以《四書大全》為讀本，遂亦令講程朱之學者亦多行偽品陋之徒。黃宗羲〈李杲堂文鈔序〉：

科舉盛而學術衰。昔之為時文者，莫不假道於《左》、《史》、《語》、《策》、《性理》、《通鑑》，既已搬涉運劑於比偶之間，其餘力所沾溉，雖不足以希作者，而出言尚有根抵，其古文固時文之餘也。今之為時文者，無不望其速成，其肯枉費時日於載籍乎？故以時文為墻壁，驟而學步古文，胸中茫無所主，勢必以偷竊為工夫、浮詞為堂奧，蓋時文之力不足以及之也。¹³⁰

宗羲認為八股文原本亦屬古文之餘，也經歷盛衰之變，但因舉業追求實效，速成的壓力，逼得士子「以偷竊為工夫，浮詞為堂奧」，形成制度性腐壞。熊賜履奏疏云：

士子惟揣摩舉業，為弋科名、掇富貴之具，不知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高明者或汎濫於百家，沉淪於二氏，斯道淪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乞責成學院、學道，統率士子，講明正學，特簡儒臣使司成均，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於是考諸六經之文，監於歷代之跡，實體諸身心，以為敷政出治之本。¹³¹

此疏在康熙6年(1667)，恰好為宗羲越城開證人講會宣示「經術所以經世，必證明於史籍」之論的翌年。賜履平生不治史學，疑遙聞宗羲言論，吸收轉化，¹³²但亦足以顯示宗羲所言，實為讜論，影響遠至京師。而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條亦痛陳此弊：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勦襲，得於假

¹³⁰ [清]黃宗羲：〈李杲堂文鈔序〉，頁27。

¹³¹ 趙爾巽等著：《清史稿·熊賜履傳》第33冊，卷262，頁9892。

¹³² 熊賜履素不治史學，「監於歷代之跡」一語並非熊所能言。熊氏所謂「考諸六經之文」，即梨洲之「原本於經術」；熊所謂「監於歷代之跡」，即梨洲之「證明於史籍」；熊所謂「實體諸身心」，即梨洲之「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熊於京師遙聞梨洲緒言，一轉手易成己語。[清]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頁1059。

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為何書者。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¹³³

「擬題」就是樣板題目與答案，一旦成為主流，原書自然被士子束之高閣，結果和焚書並無兩樣，都是讓經典成為廢紙。失去了經典通才教育，知識與道德都沒有了基礎，人才敗壞就成為必然。下有八股文擬題之病，上則國家編修《四書五經大全》出現制度性腐敗，《日知錄》「四書五經大全」條：

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¹³⁴

《大全》剿襲前人之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集體腐敗，莫此為甚。晚明以降，儒者多揭露科舉之弊，陸世儀言：

今天下之精神皆耗於帖括矣，誰肯為真讀書人，而國家又安得收讀書之益哉！¹³⁵

帖括之學，儒林批判極烈。可惜滿清初治中國，除頭髮服色外，皆襲用勝朝禮制，八股文取士亦一仍舊貫，未予改革，復因八股文有利於忠誠教育，鼓勵士子逢迎上意，¹³⁶積弊益重。

¹³³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點校：《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945-946。

¹³⁴ 同上註，卷18，頁1043。

¹³⁵ 〔清〕陸世儀：《陸桴亭思辨錄輯要·格致類》，收於〔清〕張伯行輯：《正誼堂全書》第1冊，收於嚴一萍輯：《百部叢書集成》第26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卷4，頁6a-b，「格致」。

¹³⁶ 說詳鄭吉雄：《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第9章〈章學誠「官師合一」說對清代科舉制度的批判〉，頁323-346。

七、由經史到經世：儒學知識範疇的擴充

回歸古典中「儒」的流品，《周禮·天官·冢宰》：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¹³⁷

師、儒之別，章太炎釋為「經師」與「儒家」，同出於孔子，而前者流為傳經之儒如申培公、轅固生等，後者流為孟子、荀卿。¹³⁸然而秦朝「以吏為師」，已無師、儒之別。且漢儒經書，或傳自大儒口授而有今文經，或由壁中書而有古文經。故「經師、儒家」未截然區別。¹³⁹二十四史中，《史記》始立〈儒林傳〉，從孔子及其弟子始，以記經傳授受源流。¹⁴⁰倘棄「道學」之名而將一切總歸「儒林」，則《史記·儒林列傳》以孔子為先，錄《五經》授受，立論最正，堂廡至大。〈太史公自序〉所謂「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¹⁴¹即是此意。可見「儒」的身分、職分、責任、道統均不能脫離《五經》之學。捨「儒」，則無人能傳授《五經》；捨「經」，則「儒學」失去根基土壤。即使宋儒在《五經》之外另編《四書》，其中〈學〉、〈庸〉二篇亦係《禮記》兩章，《論語》、《孟子》亦收入清儒刊刻之《十三經》。誠如宗義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中明確指出：「儒林亦為傳經而設。」傳經責任，只有儒者能肩負。經學

¹³⁷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於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3冊，卷2，頁14b。

¹³⁸ 章太炎〈論諸子學〉：「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則刪定《六經》是也；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則《論語》、《孝經》是也。由前之道，其流為經師；由後之道，其流為儒家。」章太炎：〈論諸子學〉，《演講集（上冊）》，收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念馳編訂：《章太炎全集》第14冊，頁51。按：此為太炎1906年在日本演講文稿，當年9月秀光社鉛字排印，又載《國粹學報》1906年9月8日及10月7日。

¹³⁹ 章太炎則認為：「《漢書》以周、秦、漢初諸經學家錄入〈儒林傳〉中，以《論語》、《孝經》諸書錄入〈六藝略〉中。此由漢世專重經術，而儒家之荀卿又為《左氏》、《穀梁》、《毛詩》之祖。此所以不別經、儒也。若在周、秦，則固有別。」荀子傳經，最足以說明經、儒不分的實況。同上註。

¹⁴⁰ 《史記·儒林列傳》：「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漢]司馬遷：《史記》第8冊，卷121，頁3116。

¹⁴¹ [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頁3920。

興則儒學興，經學廢則儒學廢。這正是清初儒者倡議回歸《五經》的根本原因。

論及經學的提倡，主要還要聚焦於開風氣的幾位儒林領袖。顧炎武是第一人。順治年間，顧氏變賣家產，浪遊北方，歷山東、河南、河北各地，後定居華陰，期間撰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經術即經學，治道即史學，博聞則輔翼經史。《日知錄》上承黃震（東發，1213-1281）《黃氏日抄》、王應麟（深寧，1213-1281）《困學紀聞》的工作，所謂「採山之銅」，¹⁴²內容貴精不貴多，在諸經之考訂、經義之切用、義理之發明，其功甚大。即此已明確宣示「儒」的知識圖譜必以《五經》為基礎。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稱許宗義：

先生始謂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¹⁴³

祖望述宗義之學，經、史並舉，仍強調經學是儒學原本。「蹈虛」之「虛」，指涉晚明講學游談無根之風。萬斯同承宗義之命赴京助徐元文修《明史》，但堅持以布衣參史局，主於徐府，不署銜，不受俸。¹⁴⁴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云：

崑山徐侍郎乾學居憂，先生與之語喪禮，侍郎因請先生纂《讀禮通考》一書。上自國卹，以訖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為《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之深於經。¹⁴⁵

¹⁴² [清]顧炎武：〈與人書十〉，《顧亭林詩文集》，卷4，頁97：「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

¹⁴³ [清]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頁1059。

¹⁴⁴ 《清史列傳·儒林傳下·萬斯大·弟斯同》：「會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元文為總裁，欲薦斯同入館局，斯同復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斯同性不樂榮利，見人惟以讀書、勵名節相切劘。」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1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68，頁5465-5466。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之。」[清]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頁518-519。

¹⁴⁵ 同上註，頁519。

《南雷集》收錄宗義〈答萬季野喪禮雜問〉及〈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¹⁴⁶即斯同研究喪禮時去信徵詢宗義意見後宗義的回覆。

清初以治經鳴世的尚有毛奇齡，其節行頗有爭議，¹⁴⁷毛奇齡原不治經學。施閏章〈毛子傳〉說：

毛姓，蕭山人也。初名西河，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髡也。」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與人坦然無所忤。¹⁴⁸

康熙 5 年（1666）宗義於紹興開證人講會，翌年受萬氏家族之邀，轉往寧波開講。奇齡赴紹興古小學參與，聽聞宗義經史之學緒餘，始開始專治經學。邵廷采〈候毛西河先生書〉讚賞奇齡推重鄉先輩王守仁之學。¹⁴⁹而據李塉〈上毛河右先生書〉，曾從奇齡學《樂》，極其禮重。¹⁵⁰蓋因《樂》在《六經》之中久佚，而奇齡以早歲擅樂府詩詞度曲，而以知音律而獲推重。奇齡於康熙 18 年（1679）舉博學鴻詞科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館纂修，可證其榮祿之心。自居北京後，專意經學。

¹⁴⁶ [清]黃宗義：〈答萬季野喪禮雜問〉、〈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南雷詩文集》上冊，頁 196-200、207-209。

¹⁴⁷ 推許奇齡的有顏元（習齋，1635-1704）、李塉、施閏章（愚山，1618-1683）、邵廷采（念魯，1648-1711）。王源〈與毛河右先生書〉：「（顏）先生遂逝，所持高山之仰為斯道之依歸者，舍先生（按：指奇齡）更何人？」[清]王源：〈與毛河右先生書〉，《居業堂文集》第 3 冊，卷 8，頁 25a-b。而批評他的則極醜詆，如陶元藻（篁村，1716-1801）《全浙詩話》。全祖望曾輯《蕭山毛氏糾繆》十卷（今不傳），又著〈蕭山毛檢討別傳〉，收於《鮚埼亭集外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12，頁 985-989。說詳鄭吉雄：《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第 6 章〈全祖望論毛奇齡〉，頁 215-247。

¹⁴⁸ [清]施閏章：〈毛子傳〉，《學餘堂文集》，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13 冊，卷 17，頁 11a。施〈傳〉基本上取材自毛奇齡〈自銘〉，但亦加入了一些〈自銘〉沒有的材料，如下文所稱奇齡的仇人發篋焚稿一事，以及所謂「跌蕩文酒，頗不自惜」等評語。[清]施閏章：〈毛子傳〉，頁 11b-12b。

¹⁴⁹ 邵廷采〈候毛西河先生書〉：「本朝大儒如孫徵君、湯潛庵，皆勤勤陽明，至先生而發陽明之學乃無餘蘊。而天下之人，或以微議朱學為先生病，竊見先生立身處家、細行大德，無悖于朱子家法，特欲揭陽明一原無間之學以開示後覺。」[清]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 19 年徐氏鑄學齋刊本，1893 年），卷 7，頁 8a-b。

¹⁵⁰ 李塉：〈上毛河右先生書〉：「《學樂》二卷，久為先生所梓。丙戌張采舒見過，論樂相左，客歲始有校正為《學樂》卷三，不知是否。今呈政。采舒有《駁樂錄語》二冊，鄙言未足剖諍，欲同奉上求先生明辨之，以定一是。」[清]李塉：《恕谷後集》第 2 冊，卷 4，頁 2b。

清初經史之學隱含「經世」微旨，亦屬晚明儒林思潮餘波。陸世儀提議科舉當「切於世用」，設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等科。其中較引人注目的是「兵法」的提倡，亦係全祖望所述黃宗羲論史學「足以應務」的發揮。世儀於崇禎 6 年（1633）撰《八陣發明》一卷，似非孤例。錢謙益〈謝象三五十壽序〉說：

君初為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談犁庭掃穴之舉。¹⁵¹

由此可見當時儒林已有不少士人「自負才略」而「好談兵事」。晚明陳子龍《皇明經世文編》亦收錄不少論兵法、軍事的文章。以其中「陽明事功」部分而論，《文編》由第 130 至 132 卷選輯《王文成公文集》，凡三卷，計四十五篇文章，所錄主要為王守仁平定浞頭、八寨斷藤峽，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交界剿匪（即後來議設和平縣之地），撫南贛、思恩田州的方略及平定宸濠的奏疏等，均詳細記載守仁用兵及文治的方略。而宗羲《明夷待訪錄》亦有「兵法」三篇。說到好談兵事，當數「生平為文，論兵者居多」的王源。清初學者的經史之學與前代不同，在於從經史延申到其他相關領域知識，展現出博聞的趨向，也就是余英時師「知識主義」的焦點。其一為天文學。晚明耶穌會士來華傳授天文曆算之學，影響最大。徐光啟〈泰西水法序〉：

余嘗謂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而其緒餘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之學。象數之學，大者為曆法、為律呂。至其他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事，無不賴以為用，用之無不盡巧極妙者。¹⁵²

¹⁵¹ [清]錢謙益：〈謝象三五十壽序〉，《牧齋初學集》中冊，卷 36，頁 1018。謝象三即謝三賓（1593-1672），全祖望〈七賢傳〉：「丙戌而後，吾鄉所最不齒者，無如故太僕謝三賓，其反覆無行，搆殺故國忠義之士無算。」[清]全祖望：〈七賢傳〉，《鮚埼亭集外篇》，收於[清]全祖望著，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卷 12，頁 980。

¹⁵² [明]徐光啟：〈泰西水法序〉，收於[明]徐光啟著，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卷 2，頁 66。按：〈泰西水法〉收入《天學初函》「器編」所撰，有數篇〈序〉，其一為徐光啟

程朱「格物窮理」之教未發展出物理學，泰西學術反而做到了。格物窮理又旁出「象數之學」，這並非指傳統《易》家在象數占筮上玩弄光景，而是切實用於治國治民的治曆明時之學。如黃宗羲著《易學象數論》六卷、《曆學假如》二卷、《授時曆故》四卷並附《日月經緯》（原題《新推交食法》）二卷。自秦漢傳上古《周髀算經》以來，漢代落下閎（長公，前156-前87）與司馬遷製「太初曆」，劉歆（子駿，約前50-公元23）製「三統曆」，《後漢書》記漢代賈逵（梁道，174-228）論曆、唐代李淳風（602-670）製「麟德曆」等，歷代正史均有「律曆志」，記述其事。直至北宋邵雍撰《皇極經世書》，因為缺乏天象知識，其數始終不能完全合天。董作賓（彥堂，1895-1963）《中國年曆總譜》論之甚詳。清中葉阮元《疇人傳》列「國朝」有王錫闡（曉庵，1628-1682）、潘耒（力田，1626-1663）、薛鳳祚（儀甫，1600-1680）、楊光先（長公，1597-1669）、方中通（位伯，1634-1698）、杜知耕（端甫）、黃宗羲、梅文鼎（定九，1633-1721）等。清初天算學家中以文鼎為最著，「所著曆算之書凡八十餘種」，¹⁵³在《疇人傳》中獨占37、38、39三卷，最為突出。梅氏對前賢之法甚為熟悉並有所糾正，如前述楊光先不明推步之數，故所著《不得已》「日食圖」有誤，梅氏即著《交食作圖法訂誤》一卷。但梅氏之法，終亦因缺乏實際觀測的科技（如天文望遠鏡），只能站立地面測量天球（celestial sphere）日月星辰投射於地面所顯示其運行的度數來計算，正如《疇人傳》本傳說：

今別立新法，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為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為直線，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¹⁵⁴

用這種方法計算日月合朔、交食等已不無毫釐之差，用來觀測恆星更不能合。¹⁵⁵自清初曆算名家輩出，儒林受影響，即使像陸隴其以理學家，其《三

撰。該書由耶穌會士熊三拔撰說，徐光啟筆記，李之藻編訂，見〔明〕李之藻編，黃曙輝點校：《天學初函編器（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5。

¹⁵³ 〔清〕阮元：《疇人傳》，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337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37，頁459。

¹⁵⁴ 同上註，頁461。

¹⁵⁵ 因地球、月球之自轉均有顫動（axial precession）而致不穩定，如太陽年（地球圍繞太陽

魚堂日記》亦曾記讀鮑雲龍（景翔，1226-1296）《天原發微》、陸桴亭《分野圖》、《月道圖說》。其中論「月行」一條甚詳盡，文長不錄。隴其常注意天文曆法，《日記》康熙戊午（1678）6月23日記柯崇樸（寓匏）問《春秋》「春王正月當主何說」；¹⁵⁶ 8月26「到欽天監」有兩段文字申論。¹⁵⁷ 9月初四有一段討論《春秋》孔《疏》論日月行道及月食。¹⁵⁸ 9月初八記「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歷書亡矣。……』」¹⁵⁹據寓匏問「春王正月」一條看，隴其說「當折衷於程朱」，¹⁶⁰已顯示他對曆法雖未有專攻，卻十分留心，足見風氣所在，影響一時士人甚鉅。

天文學與地理學相為表裡。明末清初天文學承前朝耶穌會士傳入天文曆算之學，而有成就。同時期儒林研究地理學的特多，如顧祖禹（宛溪，1631-1692）自順治年間已始著《讀史方輿紀要》，至康熙31年（1692）完成，凡一百三十卷（從始撰至今歷時約三十年）。此外則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最著名，而黃宗羲著成《明夷待訪錄》，顧炎武致書討論，亦特針對地理經濟問題提出不同意見。¹⁶¹清代地理學大盛，端靠兩大因素，其一即明末士大夫懲於偌大王朝迅速覆滅，而意識到考知地方制度沿革及地理關隘的重要性，故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均提議恢復封建，¹⁶²顧祖禹、

一週回到原點）與回歸年（二分二至一循環之長度）相差約20分鐘，造成歲差。即無法以地面方位投射於天球位置來測量。

¹⁵⁶ [清]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4，頁35a。

¹⁵⁷ 同上註，卷5，頁7b-9a。

¹⁵⁸ 同上註，頁13a-14a。

¹⁵⁹ 同上註，頁18a。

¹⁶⁰ 程朱並不專治曆，隴其「折衷於程朱」之說不知何據。又說：「如古未立歲差之法，或至差遠，方始脩改；又閏法亦未精，有再失閏，隔數年而補閏者，安可以後世之歷法，而定《春秋》之歲月哉？如此說，方見歷法未足據。」筆者按：隴其的意思是：曆法後起，不可用後起的曆法定先出的《春秋》歲月。這的確如此。隴其又謂「司馬光《通鑑目錄》云：『太初歷未改以前，閏月皆在歲末。』」則知古之閏，原無一定之例，而不知殷商時期，歲末置閏及歲中置閏均曾實施。同上註，卷4，頁35a-b。

¹⁶¹ 〈顧寧人書〉（丙辰〔1676〕）：「炎武以管見為《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清]顧炎武：〈顧寧人書〉，頁1b。

¹⁶² 黃宗羲《留書》有〈封建〉篇，後改寫入《明夷待訪錄》為〈方鎮〉篇。又呂留良曾論封建為公天下之制，郡縣為私天下之制，由主張恢封建，進而發揮《春秋》華夷之別、夷夏之防的排滿思想。後經曾靜（蒲潭，1679-1736）宣揚而引起清世宗撰《大義覺迷錄》加以批判。

顧炎武二鉅著即代表性成果。其二是清政府主導編修《一統志》，引起清代修志的潮流。議修《一統志》者為貳臣衛周祚（文錫，1612-1675），於康熙 11 年（1672）上疏。《清史列傳·貳臣傳》本傳：

（周祚）言各省通志尚多闕略，宜敕儒臣修纂，舉天下地理、形勢、戶口、田賦、風俗、人才，燦然具列，彙為《一統志》，以備御覽。上並嘉納之。¹⁶³

「一統志」編修，掀起了清朝各地修方志的熱潮，至清末不衰。這是出於清政府政策，不算是儒林自發性的作為。不過由於康熙 25 年（1686）徐乾學受命充「一統志」、「會典」及「明史館」三館總裁，廣邀學者參與其事，參與工作的儒者就順勢將古典研究擴及地理學，即屬儒林自發性研究。康熙 29 年（1690）《一統志》編修正式啟動，胡渭（拙明，1633-1714）與閻若璩（潛丘，1636-1704）、顧祖禹、黃儀（子鴻）赴蘇州襄助編撰。兩年後顧祖禹順完成了《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康熙 36 年（1697）胡渭完成《禹貢錐指》二十卷；¹⁶⁴約於同時閻若璩亦撰成《四書釋地》四卷（含續、又續、三續）。稍後蔣廷錫（南沙，1669-1732）著《尚書地理今釋》一卷；江永（慎修，1681-1762）著《春秋地理考實》四卷，程瑤田（易疇，1725-1814）撰《禹貢三江考》三卷，宋翔鳳（虞庭，1779-1860）撰《四書釋地辨證》二卷等。¹⁶⁵清儒地理學成果斐然，道光以後更有《四洲志》及《海國圖志》等，擴及海外。天文地理知識的深汲，可證晚明以降知識多元化浪潮一斑。

天文、曆算、地理之學是經史之學的擴充。梅文鼎治天文曆算，雖不是為解決經學問題，但亦有裨於經學。後來戴震研究《周髀算經》則徹底將天文曆算拉回經學範疇。如《經考》「周正朔」條：

夏時、周月，其說甚異，實由「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一語，尹氏、胡氏、蔡氏緣之，而議論滋紛矣。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夫謂周正月非夏時之春則可，謂周正月周不謂之春則不可。吾友吳行先告余曰：「程子及胡氏之意，周雖改正朔，而周

¹⁶³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 20 冊，卷 79，頁 6590。

¹⁶⁴ 附地圖 47 幀，收於《皇清經解》卷 27-47。

¹⁶⁵ 自《四書釋地》以下諸書，分別收於《皇清經解》卷 207；卷 252-255；卷 542-544；卷 1329-1330。

正月之非春，雖周亦只謂之冬，不謂之春。……」余曰：「……以周人言，商、周改月如梓慎；以漢人言，商、周改時如陳寵，皆明據也。後儒去古彌遠，曆不可得見，又未能坐知千歲日至，徒以空言說經，往往失之。凡立言者，慎之又慎，有疑則闕，毋鑿說，毋改經，其斯為今日讀書之法律歟！」¹⁶⁶

這段考證，戴震批評程朱解經，¹⁶⁷更指出漢儒亦難免空言說經。近代研究義理者常鄙視考證學，譏為故紙堆中求勝負。這只說明了他們對考證學的精神無知。我常說，考證學是一把兩面刃，可以割制他人，當然亦能割制自己，因為考證學精神在於「求真」，學者以新知識審視固有謬誤，後人亦將掌握新知識（如出土文獻或科學發現）端正他們的錯誤。戴震以「有疑則闕，毋鑿說，毋改經」，提醒優先尊重經典，沒有十分把握寧可闕疑。這正是在人文學中體現科學精神的證明！他批評宋儒勇於「改經」，而宋儒改經最著者為朱子《大學章句》；所謂「今日讀書之法」，欲暗諷《朱子語類》「朱子讀書法」未考慮及此，其意甚明。

明清經史之學復興，經世思潮亦起，初啟端於晚明。馮應京《皇明經世實用編》、陳仁錫《八編經世類纂》、陳子龍等《皇明經世文編》，均值講晚明學風衰敝、經史之學復興的時刻。前文已有介紹。而「經世」的命題，亦見於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撰成於康熙2年〔1663〕），貫串《五經》與諸史而討論十三個國家法制問題，提出「經世」可謂名正言順！萬斯同早年撰〈與從子貞一書〉提出「經世」非「經濟」。¹⁶⁸宗羲《待訪錄》未獲清聖祖「待訪」，所昭示的「經世」理念亦終歸沉寂。此後清聖祖、世宗、高宗三帝均屬強勢君主，漢族士大夫沒有絲毫機會能效法宋代王安石（介甫，

¹⁶⁶ [清]戴震：《經考》，收於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第2冊，卷5，頁325-327。余英時先生《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注「商周改月如梓慎」說：「英時案：《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注「商周改時如陳寵」說：「英時案：《後漢書》卷七十六本傳陳寵引《時令》謂十一月『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頁161-162。

¹⁶⁷ 筆者按：《詩·豳風·七月》：「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然則周正以夏曆十一月為正月，「卒歲」尚在其後，則程子之說未必誤。〔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收於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2冊，卷8之1，頁9a。

¹⁶⁸ 說詳鄭吉雄：《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第3章之「附錄」、第4章〈萬斯同的經世之學〉，頁143-150、頁151-160。

1021-1086) 得位行道、變法經世。回顧「經世」一詞，出自《莊子·齊物論》：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¹⁶⁹

成玄英(子實，608-669)《疏》將「春秋」釋為「時代也」；將「志」讀為「誌」，釋為「記也」，¹⁷⁰實為誤釋。「《春秋》」應讀為《五經》之一，孔子筆削之書。「《春秋》經世」，實即《史記·太史公自序》「余聞董生曰」所說：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¹⁷¹

「議」即褒貶以彰是非，「辯」即不討論細節。¹⁷²故「經世」近於歐美漢學家通譯為「ordering the world」，背後即以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體現在《春秋》，即〈太史公自序〉所謂：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疑，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¹⁷³

萬斯同雖參與明史館任修撰工作，但今存《明史》似乎沒有多少出自斯同之手。《石園文集》倒是保留了若干評論明史人物的篇章，亦清楚看出斯同喜用鮮明的詞彙，決斷明代人物賢奸是非。顯然地，斯同內心始終追慕太史公所述董生闡發《春秋》精神，以豐富其年輕受《待訪錄》影響的「經世」思想。

經世思潮在清代再興，已是 18 世紀末。先是乾隆 40 年(1775)陸燿(朗甫，1722-1785)刊《切問齋文鈔》三十卷，¹⁷⁴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共十二門。仁宗(嘉慶)即位，正值白蓮教動亂熾盛，於 7 年(1802)、18 年(1813)、

¹⁶⁹ [清]郭慶藩編：《莊子集釋》上冊，卷 1 下，頁 83。

¹⁷⁰ 成《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項，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為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同上註，頁 85。

¹⁷¹ [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3297。

¹⁷² 《穀梁》、《公羊》二傳釋義，而《左傳》傳事。故今文經學家多認為《左傳》違背孔子筆削之義。

¹⁷³ [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3297。

¹⁷⁴ 國家圖書館藏有清乾隆 40 年(1775)吳江陸氏家刊本。

23 年（1818）三度下詔罪己，並廣言路，但成效不彰。嘉慶 9 年（1804）白蓮教亂平，朝廷始查禁英國傳教士印製刊物。15 年（1810），江浙試辦海運，以費用過鉅而罷。

自陳建（清瀾，1497-1567）《學蔀通辨》刊行，「異端—異族」的困擾在中國如影隨形，揮之不去。滿洲入主中原後，至道光年間，士大夫加速吸收外國知識。¹⁷⁵道光 6 年（1826）賀長齡、魏源合編《皇朝經世文編》（即《清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收錄文章計 2236 篇。自此以後，以經世、時務、西學等詞語為書名的叢書大增。以「經世」為題的計有數十種，¹⁷⁶則經世風潮可謂盛極一時。道光以降，「經世」之風再起，著作數量之多，不下於考證學。由此觀之，經學、經世二者。¹⁷⁷一個「經」字，實足代表清代儒學精神。

從清代儒者學術興趣考察，乾隆儒者已大量從事先秦諸子學的研究，不限於《論語》、《孟子》，而是遍及諸子。¹⁷⁸其餘詩詞小說文學批評亦多可觀。由此可見，清代儒學遍涉四部，且饒特殊價值。其扭轉明代儒學偏乏之病，實無疑問。

八、結論

本文考察近世中國「儒」的論說，認為歷史上「儒林」之稱，實因「儒」為一群體形成之社會階層，與時代升降相為表裡。故「儒」的身分設定，取決於儒林群體自覺，以及群儒的治學內容，而不取決於某幾位儒者的夫子自道。故本文所論，視野較寬，不限於理學家或經學家。牟宗三先生指明清時期異族入關及考證學興盛而導致儒門學絕道喪，與史實並不相符。明末理學衰微，肇因於儒者耽於「理」的講論，導致知識嚴重貧乏，由此

¹⁷⁵ 可參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年）。

¹⁷⁶ 說詳鄭吉雄：《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年），頁 355-356。

¹⁷⁷ 「經世」包括強調「應務」的史學。

¹⁷⁸ 說詳鄭吉雄：《乾嘉治經方法中的思想史線索——以王念孫《讀書雜誌》為例》，《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頁 403-447。又參鄭吉雄：《〈先秦諸子繫年〉的歷史考察——方法與思潮》，收於李帆、黃志強、區志堅主編：《重訪錢穆》上冊（臺北：秀威科技資訊公司，2021 年），頁 213-237。

而激發儒者掀起知識多元化運動，從文章、經史、經世等各類知識充實儒學，進而奠定了清代儒學的基調。

近世中國「儒」的論爭，可上溯《後漢書》於〈儒林傳〉外另立〈文苑傳〉。宋儒從經學中發展新天地，啟《宋史》於〈儒林傳〉外另立〈道學傳〉之端。誠如揚雄說：「通天地人曰儒。」¹⁷⁹徐光啟說：「諸君子講學論道，所求者亡非福國庇民。」¹⁸⁰晚明儒者倡三教，迎合非儒學之論，以為共法，知識枯槁，空談無根，不待滿洲高壓統治，已病入膏肓。黃宗羲呼籲一切「總歸儒林」，可謂振聵發聵。明清儒學典範性的轉化，實受惠於晚明儒學衰微的刺激。借用龔自珍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清代多元而充實的儒學開花結果，實得力於晚明儒學的花落腐土，化為春泥。

儒學原是綜合性學問，立足經史子集，涵蓋政治、歷史、天文、地理。儒門之「道」多元，包括聖人之道、率性之道、文以載道等等。至於史學、事功、文學、諸子學諸端，則體現出儒者將古典文獻知識轉化為解決現實問題的智慧。黃宗羲「儒林為傳經而設」一語，更指出了儒學不能脫離經學。故經學盛則儒學盛，經學衰則儒學衰。只是二十世紀至今世界秩序、文明進步、價值觀念已日新月異，儒學已顯衰微，經學亦難以為繼。未來當如何因應發展，尚待有識之士探索。

【責任編校：何品軒、黃競緯】

徵引文獻

專著

〔漢〕毛亨 Mao Heng 傳，〔漢〕鄭玄 Zheng Xuan 箋，〔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等正義：《毛詩正義》*Maoshi zhengyi*，收入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Shisan jing zhushu fu jiaokan ji* 第2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97 年。

〔漢〕班固 Ban Gu 著，〔唐〕顏師古 Yan Shigu 注：《漢書》*Han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4 年。

¹⁷⁹ 〔漢〕揚雄：《法言·君子》，收於〔漢〕揚雄原著，汪榮寶著，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卷 18，514。

¹⁸⁰ 〔清〕徐光啟：〈泰西水法序〉，頁 67。

- [漢]揚雄 Yang Xiong 原著，汪榮寶 Wang Rongbao 著，陳仲夫 Chen Zhongfu 點校：《法言義疏》*Fayan yishu* 下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年。
- [漢]趙岐 Zhao Qi 注，[宋]孫奭 Sun Shi 疏：《孟子注疏》*Mengzi zhushu*，收入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Shisan jing zhushu fu jiaokan ji* 第 8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97 年。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禮記正義》*Liji zhengyi*，收入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Shisan jing zhushu fu jiaokan ji* 第 5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97 年。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賈公彥 Jia Gongyan 疏：《周禮注疏》*Zhouli zhushu*，收入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Shisan jing zhushu fu jiaokan ji* 第 3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97 年。
- [漢]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Shi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9 年。
- [魏]王弼 Wang Bi、[晉]韓康伯 Han Kangbo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正義：《周易正義》*Zhouyi zhengyi*，收入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Shisan jing zhushu fu jiaokan ji* 第 1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97 年。
- [魏]何晏 He Yan 注，[宋]邢昺 Xing Bing 疏：《論語注疏》*Lunyu zhushu*，收入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Shisan jing zhushu fu jiaokan ji* 第 8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97 年。
- [南朝宋]劉勰 Liu Xie 著，范文瀾 Fan Wenlan 注：《文心雕龍注》*Wenxin diaolong zhu*，臺北 Taipei：臺灣開明書店 Taiwan kaiming shudian，1967 年。
- [宋]陳亮 Chen Liang 著，鄧廣銘 Deng Guangming 點校：《陳亮集（增訂本）》*Chen Liang ji (zengding ben)* 下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年。
- [元]脫脫 Tuo Tuo 等：《宋史》*Song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年。

- 〔明〕王禕 Wang Yi：《王忠文公集》*Wangzhongwengong ji* 第1冊，收入〔清〕胡鳳丹 Hu Fengdan 輯：《金華叢書》*Jinhua congshu* 第27函，收入嚴一萍 Yan Yiping 輯：《百部叢書集成》*Baibu congshu jicheng* 第95輯，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0年。
- 〔明〕宋濂 Song Lian 等著：《元史》*Yuan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6年。
- 〔明〕李之藻 Li Zhizao 編，黃曙輝 Huang Shuhui 點校：《天學初函編器（上）》*Tianxue chuhan bianqi (shang)*，上海 Shanghai：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chubanshe，2013年。
- 〔明〕徐光啟 Xu Guangqi 著，王重民 Wang Chongmin 輯校：《徐光啟集》*Xu Guangq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3年。
- 〔明〕陳子龍 Chen Zilong 等輯：《皇明經世文編》*Huang ming jingshi wenbian*，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1655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年。
- 〔明〕錢駉 Qian Xing：《甲申傳信錄》*Jiashen chuanxin lu*，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440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年。
- 〔明〕歸有光 Gui Youguang 著，周本淳 Zhou Benchun 校點：《震川先生集》*Zhenchuan xiansheng ji*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7年。
- 〔明〕羅洪先 Luo Hongxian：《念菴文集》*Nian'an wenji*，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1275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1986年。
- 〔清〕方苞 Fang Bao 著，劉季高 Liu Jigao 校點：《方苞集》*Fang Bao ji*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3年。
- 〔清〕毛奇齡 Mao Qiling：《西河集》*Xihe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1320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1986年。

- 〔清〕王夫之 Wang Fuzhi：《讀通鑑論》*Du tongjian lun*，收入〔清〕王夫之 Wang Fuzhi 著，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 Chuanshan quanshu bianji weiyuanhui 編校：《船山全書》*Chuanshan quanshu* 第 10 冊，長沙 Changsha：嶽麓書社 Yuelu shushe，1996 年。
- 〔清〕王源 Wang Yuan：《居業堂文集》*Juyetang wenji* 第 3 冊，收入〔清〕王灝 Wang Hao 輯刊：《畿輔叢書》*Jifu congshu* 第 46 函，收入嚴一萍 Yan Yiping 輯：《百部叢書集成》*Baibu congshu jicheng* 第 94 輯，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6 年。
- 〔清〕全祖望 Quan Zuwan：《鮚埼亭集內編》*Jieqiting ji neibian*，收入〔清〕全祖望 Quan Zuwan 著，朱鑄禹 Zhu Zhuyu 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Quan Zuwan ji huijiao jizhu*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0 年。
- ：《鮚埼亭集外編》*Jieqiting ji waibian*，收入〔清〕全祖望 Quan Zuwan 著，朱鑄禹 Zhu Zhuyu 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Quan Zuwan ji huijiao jizhu* 中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0 年。
- 〔清〕呂留良 Lü Liuliang：《呂晚村先生文集》*Lü Wancun xiansheng wen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1411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清〕李紱 Li Fu：《穆堂初稿》*Mutang chugao*，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1421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清〕李塉 Li Gong：《恕谷後集》*Shugu houji*，收入〔清〕王灝 Wang Hao 編：《畿輔叢書》*Jifu congshu* 第 24 函，收入嚴一萍 Yan Yiping 輯：《百部叢書集成》*Baibu congshu jicheng* 第 94 輯，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6 年。
- 〔清〕阮元 Ruan Yuan：《疇人傳》*Chouren zhuan*，收入王雲五 Wang Yunwu 主編：《叢書集成初編》*Congshu jicheng chubian* 第 3373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1 年。
- ：《擘經室一集》*Yanjingshi yi ji*，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著，鄧

- 經元 Deng Jingyuan 點校：《擘經室集》*Yanjingshi ji*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3 年。
- 〔清〕邵廷采 Shao Tingcai：《思復堂文集》*Sifutang wenji*，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 19 年徐氏鑄學齋刊本，1893 年。
- 〔清〕姚鼐 Yao Nai 著，劉季高 Liu Jigao 標校：《惜抱軒詩文集》*Xibaoxuan shiwe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2 年。
- 〔清〕施閏章 Shi Runzhang：《學餘堂文集》*Xueyutang wenji*，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第 131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1986 年。
- 〔清〕段玉裁 Duan Yucai 編：《戴東原先生年譜》*Dai Dongyuan xiansheng nianpu*，收入北京圖書館 Beijing tushuguan 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Beijing tushuguan cang zhenben nianpu congkan* 第 104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1999 年。
- 〔清〕唐甄 Tang Zhen 著，吳澤民 Wu Zemin 編校：《潛書：附詩文錄》*Qianshu: fu shiwen l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年。
- 〔清〕孫承澤 Sun Chengze：《考正晚年定論》*Kaozheng wannian dinglun*，國家圖書館藏清錢馥抄本。
- 〔清〕張廷玉 Zhang Tingyu 等著：《明史》*Ming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4 年。
- 〔清〕章學誠 Zhang Xuecheng 著，倉修良 Cang Xiuliang 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Wenshi tongyi xinbian xinzhu*，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05 年。
- 〔清〕郭慶藩 Guo Qingfan 著，王孝魚 Wang Xiaoyu 點校：《莊子集釋》*Zhuangzi jishi* 中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4 年。
- 〔清〕陸世儀 Lu Shiyi：《陸桴亭思辨錄輯要》*Lu Futing sibian lu jiyao*，收入〔清〕張伯行 Zhang Boxing 輯：《正誼堂全書》*Zhengyitang quanshu* 第 1 冊，收入嚴一萍 Yan Yiping 輯：《百部叢書集成》*Baibu congshu jicheng* 第 26 輯，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 影印，1969 年。

- 〔清〕陸隴其 Lu Longqi：《三魚堂日記》*Sanyutang ri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559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三魚堂文集》*Sanyutang wenji*，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Qingdai shiwen ji huibian bianzuan weiyuanhui* 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dai shiwen ji huibian* 第 11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0 年。
- 〔清〕曾國藩 Zeng Guofan 著，〔清〕王啟原 Wang Qiyuan 輯：《求闕齋日記類鈔》*Qiuquezhai riji leichao*，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559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明夷待訪錄》*Mingyi daifang lu*，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945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明儒學案》*Mingru xuean*，收入沈善洪 Shen Shanhong 主編：《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第 7、8 冊，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南雷詩文集》*Nanlei shiwen ji* 上冊，收入沈善洪 Shen Shanhong 主編：《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第 10 冊，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留書》*Liushu*，收入沈善洪 Shen Shanhong 主編：《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第 11 冊，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曆學假如》*Lixue jiaru*，收入沈善洪 Shen Shanhong 主編：《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第 9 冊，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清〕萬斯同 Wan Sitong：《石園文集》*Shiyuan wen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

- 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1415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清〕劉宗周 Liu Zongzhou 著，戴璉璋 Dai Lianzhang、吳光 Wu Guang 主編：《劉宗周全集》*Liu Zongzhou quanji* 第 2 冊，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choubuichu，1996 年。
- 〔清〕錢大昕 Qian Daxin：《潛研堂文集》*Qianyantang wenji*，收入陳文和 Chen Wenhe 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Jiading Qian Daxin quanji* 第 9 冊，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97 年。
- 〔清〕錢儀吉 Qian Yiji 纂，靳斯 Jin Si 標點：《碑傳集》*Bei zhuan ji* 第 1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3 年。
- 〔清〕錢謙益 Qian Qianyi 著，〔清〕錢曾 Qian Zeng 箋注，錢仲聯 Qian Zhonglian 標校：《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5 年。
- 〔清〕戴震 Dai Zhen：《東原文集》*Dongyuan wenji*，收入張岱年 Zhang Dainian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 6 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1995 年。
- ：《經考》*Jingkao*，收入張岱年 Zhang Dainian 主編：《戴震全書》*Dai Zhen quanshu* 第 2 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1995 年。
- ：《戴東原集》*Dai Dongyuan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1434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清〕魏禧 Wei Xi：《魏叔子文集外篇》*Weishuzi wenji waipian*，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1408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 年。
- 〔清〕顧炎武 Gu Yanwu：《顧亭林詩文集》*Gu Tinglin shiwen ji*，香港 Hong Ko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6 年。
- 〔清〕顧炎武 Gu Yanwu 著，〔清〕黃汝成 Huang Rucheng 集釋，樂保群 Luan Baoqun、呂宗力 Lü Zongli 點校：《日知錄集釋：全校本》*Rizhilu jishi*：

- quanjiaoben 中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6 年。
- 王鍾翰 Wang Zhonghan 點校：《清史列傳》*Qing shi liezh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年。
- 包賚 Bao Lai：《呂留良年譜》*Lü Liuliang nianpu*，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7 年。
- 牟宗三 Mou Zongsan：《從陸象山到劉戡山》*Cong Lu Xiangshan dao Liu Jishan*，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84 年。
- ：《中國哲學的特質》*Zhongguo zhexue de tezhi*，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94 年。
- 余英時 Yu Yingshi：《論戴震與章學誠》*Lun Dai Zhen yu Zhang Xuecheng*，香港 Hong Kong：龍門書店 Longmen shudian，1976 年。
-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Zhongguo zhishi jiecheng shilun: gudai pian*，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1980 年。
- 章太炎 Zhang Taiyan：《演講集（上冊）》*Yanjiao ji (shang ce)*，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編，章念馳 Zhang Nianchi 編訂：《章太炎全集》*Zhang Taiyan quanshu* 第 14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8 年。
- ：《檢論》*Jian lun*，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編，章念馳 Zhang Nianchi 編訂：《章太炎全集》*Zhang Taiyan quanshu* 第 3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8 年。
- 陳寅恪 Chen Yinke：《柳如是別傳》*Liu Rushi biezhuàn* 下冊，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2001 年。
- 陳鼓應 Chen Guying、辛冠潔 Xin Guanjie、葛榮晉 Ge Rongjin 主編：《明清實學思潮史》*Ming qing shixue sichao shi*，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89 年。
- 趙爾巽 Zhao Erxun 等著：《清史稿》*Qing shi g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7 年。

潘光哲 Pan Guangzhe：《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
Wanqing shiren de xixue yuedu shi (1833-1898)，臺北 Taipei：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 shi yanjiusuo，
2014 年。

鄭吉雄 Zheng Jixiong：《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Dai Dongyuan
jingdian quanshi de sixiangshi tansuo*，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08 年。

——：《近三百年歷史、人物與思潮》*Jin sanbainian lishi, renwu yu sichao*，
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2013 年。

——：《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
*Zhedong xueshu yanjiu: jindai zhongguo sixiangshi zhong de zhishi, daode
yu xianshi guanhuai*，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17 年。

鄭騫 Zheng Qian：《龍淵述學》*Longyuan shuxue*，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1992 年。

錢穆 Qian Mu：《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Zhongguo jin sanbai nian xueshu shi*，
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95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傅凱瑄 Fu Kaixuan：〈康有為《教學通義》撰作時間考辨——兼論其思想之
轉折〉“Kang Youwei *Jiaoxue tongyi* zhuanzuo shijian kaobian: jian lun qi
sixiang zhi zhuanzhe”，《臺大文史哲學報》*Taida wen shi zhe xuebao* 第
88 期，2017 年 11 月。

鄭吉雄 Zheng Jixiong：〈《先秦諸子繫年》的歷史考察——方法與思潮〉
“*Xianqin zhuzi xinian de lishi kaocha: fangfa yu sichao*”，收入李帆 Li
Fan、黃志強 Huang Zhiqiang、區志堅 Ou Zhijian 主編：《重訪錢穆》
上冊 *Chongfang Qian Mu*，臺北 Taipei：秀威科技資訊公司 Xiuwei keji
zixun gongsi，2021 年。

學位論文

傅凱瑄 Fu Kaixuan：《近代中國學界對「儒」的論爭（1840-1949）》*Jindai
zhongguo xuejie dui “ru” de lunzheng (1840-1949)*，臺北 Taipei：國立臺

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zhongguo wenxuesuo
boshi lunwen，2017 年。

